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世界五千年—影响人类历史200件大事 (16) 上



世界五千年
影响人类历史 200 件大事

大汉奸汪精卫卖国求荣

1938年12月，正当中国人民用自己的血肉长城抵御日本侵略的时候，汪精卫集团却公然认敌为友，叛国投敌。

辛亥革命以后，汪精卫一直是国民党的要人。抗战爆发时任国民党副总裁、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国民参政会议长等要职，是仅次于蒋介石的第二号人物。

汪精卫是中国现代史上的头号汉奸卖国贼。1938年，汪精卫公开叛国投敌后，成立了效忠于日本帝国主义的汪记国民政府，签订了许多卖国条约，出卖国家民族利益，帮助日本侵略者加强对我国沦陷区人民的掠夺和奴役，并且组织伪军，配合日军进攻人民军队，成为罪大恶极的中国人民的公敌。

汪精卫集团投敌，是不断受到日本诱降政策的影响而逐步酿成的历史事件。

从1937年7月抗战爆发至1938年12月汪精卫集团投敌，日本对国民党政府的政治诱降，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1937年7月抗战爆发至1938年1月德国大使陶德曼调停失败。这阶段中日两国之间虽然处于战争状态，但外交关系并未完全断绝，日本主要是通过德国出面调停，提出苛刻条件，要国民党政府接受，中国方面是以蒋介石为主要人物，汪精卫从旁推动。

抗日战争一开始，日本帝国主义叫嚷“三个月内灭亡中国”。但由于中国人民的抵抗出乎意料的激烈，日本没能达到预期的目的，就放出“和谈”诱饵。日本政府企图通过外交的途径，将中国诱导到日本所期待的境地。德国政府电令驻华大使陶德曼进行调停活动。11月5日，陶德曼向蒋介石转交了日本提出的“和谈条件”。蒋介石对陶德曼调停不加拒绝，但态度不很积极。汪精卫则不同，抗日战争开始后，汪就积极主张对日和谈。陶德曼出面调停中日战争，汪精卫等人认为和平有望，相当兴奋。马上从旁加以推动。10月30日，陶德曼会见国民党政府外交次长陈介，转达了德国政府愿意为中日直接谈判从中联系的意向。蒋介石对陶德曼转达日方所提条件的第二天，汪精卫就迫不及待地发表谈话说：“日本如愿和平，不可失去机会！”

然而，日本政府并不真想问国民党政府进行停战谈和。所谓“和谈”，只是企图灭亡中国的另一种手段。12月中，日军占领国民党政府首都南京，日本政府马上又追加新的苛刻条件，态度极为蛮横，简直是下最后的通牒。

日本政府所追加的条件，超过了蒋介石所能接受的限度，他害怕接受了日本的条件，自己的统治会被舆论冲倒，中国会发生革命，共产党就会在中国占优势，因而不敢答应。与蒋介石不同，汪精卫想通过促成“和谈”换取日本帝国主义的支持，以加强自己的政治地位。因此，汪对日本所提出的苛刻条件，认为可以考虑接受，但他的意见未被采纳。

由于中国政府没有答复接受日本所提的条件，1938年1月11日，日本召开有天皇参加的御前会议，扬言“如中国现中央政府不来求和，则今后日本不以蒋介石政府为解决事变的对手”。而要扶助建立新的中国政权，与此政权签订调整两国邦交关系协定。16日，日本首相近卫第一次对华声明。18日，国民党政府发表《维护领土主权及行政完整声明》。中日各召回大使，两国关系断绝。至此，陶德曼调停失败。汪精卫的投降目的没有达到。

第二阶段：从1938年1月近卫发表第一次对华声明后至7月，这阶段

日本采取了强硬的对华政策，但并未放弃对国民党政府诱降；国民党政府虽然发表宣言重申抗战的决心，但也并未断绝与日本谈和的愿望。因此，中日双方以半官方出面，试探和平条件。

陶德曼调停虽然失败了，但汪精卫等人迫不及待地想恢复与日本的“和谈”，周佛海说过：“我们几个同志，虽然没有方法挽回国家命运，但我们不死心，不绝望，我们暗中努力，使和平之门，不要全关，和平之线，不要全断，以便在适当时期，最后实现停战的目标。”他们为了“推动和平运动”，以搜集日本情报为由，经蒋介石、汪精卫的许可，于1938年3月派外交部亚洲司司长高宗武去香港活动。

高宗武搜集到的情报显示，日本方面的一些人在这一阶段仍然想与中国谈判。对此，汪精卫认为“这可看作日本方面的重要意见”。周佛海听了更“加强了他对日本和平的决心。”高宗武的报告送给了蒋介石。蒋介石非常重视，甚至想与日本先停战再谈细节。并令高宗武转告日本，说自己并不“反对和平”，但要先反共再和平是不可能的，“只要停战，我们自然会反共起来。”

这年4、5月间，日军虽然攻占了徐州等战略要地，但也越来越感到中国人民的抵抗能力是无穷的。同时，日本又发觉他们一手扶植起来的伪政权是一群在思想上打了败仗的人的组织。它们既不能转移中国人民敌视日本帝国主义的视线，也不能号召国民党军政人员归附到伪政权的旗帜下，对中国青年没有吸引力，靠这些人来收拾时局是不可能的。于是日本又施展了政治诱降的手法。

日本的这种姿态，对蒋介石、汪精卫都有很大的诱惑性。不过蒋介石对日本存有戒心，既不想断绝与日妥协，又不愿公开投降，日本政府对蒋这种举动是不满的，但他掌握了国民党政府的实力，又不能断然抛开他。对汪精卫，日本方面很感兴趣，但又怀疑他是否真地掌握着实权。认为仅凭汪精卫一派的力量，不足以收拾时局，日本对选择谁作为谈判的对手还举棋不定。

从1938年7月高宗武去日本，到当年12月汪精卫集团逃离重庆是日本人诱降国民党的第三阶段。这阶段日本诱降的主要对象已转向汪精卫，结果导致汪精卫集团叛国，日本的诱降政策取得了一定“成果”。

随着战争的发展，日本迫切想从长期战争的泥潭中拔出足来，因而对蒋介石越来越不满意，终于选定了汪精卫作为谈判的对手。

这年6月，高宗武又回到武汉待命。蒋介石怕高宗武往返太多会泄密，同时也怕高宗武的活动会被人利用，不想让他再去香港。但周佛海认为，高如不再去香港，与日本的联系就会中断，未请示蒋介石，就催高宗武快走，并鼓动他去东京，直接向日本政府摸底。7月初，高宗武单枪匹马潜赴东京，与日本陆军大臣板垣征四郎等进行多次会谈。双方确定以汪精卫为交涉“和平”的对手。板垣还写信给汪精卫说明此意，托高宗武代转。上述情况说明日本政府已经将诱降的对象由蒋介石转到了汪精卫。高宗武的东京之行，为汪精卫直接与日本勾结，以至后来的叛国投敌，打通了路子。

高宗武回到香港，因自己未经蒋介石同意而赴日本，不敢回武汉，将日本的意见经周佛海转汪精卫。汪一看日本要他出马主持和谈虽然高兴，但为避免被动，将报告原样交给蒋介石。蒋介石看了，认为日本无异要他下台，命陈布雷通知高宗武回武汉，停止与日本的一切接触。可是汪精卫、周佛海已经摸到日本方面的底，决心撇开蒋介石，单独与日本接洽“和平”。

由于高宗武肺病复发，与日本接洽的任务由梅思平继续执行。梅思平在香港与日方密谈多次，初步确定了汪精卫出面主持“和谈”的条件和行动方案。这时武汉、广州相继失守，中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日本政府加紧对国民党诱降。为了适应这个形势，11月3日，日本发表了第二次对华声明。宣称：“如果国民政府抛弃以前的一贯政策，更换人事组织，日本愿意与这样的新生政府和谈”。改变了第一次声明的“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方针，以便汪精卫出来取代蒋介石的地位。11月20日，梅思平、高宗武作为汪方的代表与日方的代表在上海肥原公馆重光堂举行秘密会谈，签订汪日第一个秘密协议——《日华协议记录》，并制定了汪精卫集团叛逃的行动计划。

日本的诱降政策，就这样一步一步地将汪精卫拉了过去。

其实，早在九·一八事变后，汪精卫就是一个民族失败主义者。1932年1月汪出任行政院长主持对日外交便认为：日本是个“强邻”，中国不可与之相比，因此，他主张对日本的侵略应在尽可能范围内，极力忍耐、极力让步。鉴于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已受到全国人民的强烈谴责，汪精卫提出了“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对日方针，但其实质是想以和平交涉代替武装抵抗。一·二八淞沪抗战当十九路军在上海前线与日军激战之时，国民党政府却根本不支持十九路军，暗地里与日本交涉，与日本签订了《淞沪协定》。

1933年初，日军攻占了热河，并进攻长城各口。驻长城线的中国军队，激于爱国义愤，自动抗日，但是，国民党政府不但不给予有力的支援，反而加以制止，致使长城各口相继沦陷，平津一带受到了严重威胁。4月14日，汪精卫对新闻记者发表谈话仍抱定抵抗与交涉同时并行之方针，为对日妥协制造舆论。1935年1月2日，日本外相广田弘毅发表“中日亲善、“经济提携”的所谓对华新方针，企图以此掩盖其军事侵略。汪精卫对此大加赞美。20日，他在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上报告中日外交方针时说：“读了这次广田外相的演说，认为和我们素来的主张，精神上大致吻合。中日两国既有如此的共鸣，加以相互的努力，中日关系从此可以得到改善的机会而复归于常轨，这是我们所深引为欣幸的”。不仅如此，汪精卫还立刻宣布取消抵制日货法令，宣布改变对日问题的宣传政策，随后又明令修改“有碍对日邦交”的教科书内容。5月底，日本调大军入关，进一步威胁平津。国民党政府军委会北平军分会代理委员长何应钦，与日本华北驻屯军梅津美次郎于6月初进行秘密谈判。6月9日，何应钦对日方所提的各项有损国家主权的条件，以书面答复承诺。第二天，汪精卫就致电何应钦表示认可，并以国民党政府的名义，颁布了《敦睦邦交令》，强令禁止一切抗日言行。

抗日战争爆发后，汪精卫仍然认为中国政治、经济、军事都不如日本，战必大败，只有求和才是最好的出路。但是，由于日本帝国主义妄图灭亡中国的战争政策，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抗日浪潮。面对着全国同仇敌忾、抗日情绪高昂的这种形势，汪精卫不敢把他的求和主张公开端出来，于是就来个公开言战，暗中主和。他在公开的场合发表不少慷慨激昂的演说，宣称：“万一这次抵抗不住日本的侵略，不止一切建设都要变成灰烬，所有自己的父母妻子叔伯兄弟诸姑姐妹，每个人都要遭受屠杀，每个人都要遭受非人的凌辱”，并大声疾呼：“为国家民族生存而死是光荣的”，当汉奸傀儡是“不成材料”的“无赖”！说得何等悲壮！然而在暗地里，汪精卫却依然畏敌如虎，对抗战前途，极度悲观失望。汪精卫私下常对人说：“能和就和”，“这

个仗不能再打下去了”。对抗战完会失去信心，悲观消极的情绪溢于言表。

蒋介石在抗日问题上尽管表现犹豫和动摇，但在全国人民抗日浪潮的冲击下，为了维持其自身的统治地位，不得不接受中国共产党早已提出的国共合作，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

与汪精卫相呼应的，还有周佛海一伙人。在周佛海家里，周与高宗武、梅思平、陶希圣、罗君强以及胡适、熊式辉、陈立夫等人，凑集在一起，议论抗战。他们认为这次战争“真是冤枉极了”，“是阴差阳错的打起来”的，不承认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的是侵略战争，散布抗战是“玩火自焚，前途是未可乐观”的。他们鼓吹“战必大败”，唯一的出路是从战争的途中“恢复和平”。因为他们唱的是“抗战低调”，胡适就取了一个名字，叫“低调俱乐部”。

1937年7月29日，汪精卫在南京发表“最后关头”的广播讲话，散布民族失败论调，说什么“我们是弱国，抵抗就是牺牲；牺牲的程度，我们要使每一个人，每一块地都成为灰烬”；8月4日，汪精卫又发表题为《大家要讲老实话，大家要负责任》的广播讲话，反对抗战，鼓吹对日求和。他说：“和呢，是会吃亏的，就老实承认吃亏。战呢，是会打败仗的，就老实的承认打败仗。我们不掩饰，我们不推诿，我们不作高调，以引起无谓的冲动。”他曾多次面见蒋介石，写过十几封信，要蒋介石与日本实现“和平”。他还挑拨国共两党的关系，破坏国共合作，破坏抗战。汪精卫污蔑共产党是利用中国几年来的民族意识，挑动中日战争，攻击国共合作是上了共产党的“大当”，“这种大当断断乎上不得的”，并且声言在西安事变以后，他仍然“牢牢认定剿共事业决不可中止。”表示了他要坚持反对共产党，反对国共合作的反动立场。

汪精卫与周佛海这两伙人，原来是属于国民党内两个政治派系，彼此矛盾很深，曾相互骂对方“不是东西”，都说以后“切不要和这种人一起做事”。这时，由于都主张投降，终于在国民党内形成了一个以汪精卫为头子的“主和派”。这表明，抗日战争的惊涛巨浪，已使国民党发生了新的分化。以后随着抗日战争形势发展，他们终于置国家、民族利益于不顾而叛逃投敌。

要抗日就必须联共，要降日就必然反共，因为中国共产党是抗日战争的中坚力量，也是对日求和的主要障碍。汪精卫一伙是反共的死硬派。西安事变以后，当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在形成的时候，汪精卫利用电台、报纸、会议，说国民党人接受共产党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真糊涂”，叫嚷万万不可中了他们的“挑拨离间的毒计”，竭力反对国共合作。1937年9月，蒋介石准备公开宣布国共合作。汪精卫等人得到这个消息，十分恐慌。可是迫于形势，蒋介石拖了3天，还是不得不发表了关于联合共产党的谈话。到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建立之后，汪精卫、周佛海等人则竭力挑拨国共关系，破坏国共合作。他们诬蔑共产党是“以抗日为颠覆政府的工具”，是“利用民族意识”来“摧残民族断送国家”。特别是他们看到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抗日力量获得迅速的发展，更是恐慌万状，他们除了攻击中国共产党是假借抗战“保全实力”之外，还到处散布说：“照现在的情形抗战下去，国民党必愈战愈弱，共产党必乘机得势，日见强大。为了防止共产党为患，非早日和日本讲和不可。”主张“联日反共”。

汪精卫集团的投敌，除了他们的民族投降主义思想，反共情绪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都有强烈的政治野心，都想乘国难之机飞黄腾

达。

汪精卫是一个领袖欲极强的政客。他自命不凡，不甘屈居人下，自孙中山逝世后，他就一直想当国民党的一把手。何香凝曾经说过：汪精卫这个人要么不干，要干就要当领袖。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后，汪为了争当国民党领袖，多次联合国民党内的反蒋派，和蒋介石进行了尖锐的斗争。抗战开始后，他虽然担任了国民党副总裁、国防最高会议副主席、国民参政会议长，但处于蒋介石之下，没有掌握最高权力，心里很不高兴。汪精卫为了满足自己的领袖欲，不惜叛国投敌，去当汉奸傀儡王。

周佛海也是一个政治野心家。他年青时，先是想当驰骋于国际舞台的外交家。后来又抱着一种野心，想做领导广大民众，树立革命政权的领导者。周佛海虽然颇得蒋介石的宠爱，当上了厅长、部长，并进入蒋介石的侍从室，得到蒋的器重，但他认为蒋介石对他还是没有重用，总感到不满足。周佛海被称为汪精卫叛国集团的参谋总长，筹建汪政权是由他一手具体负责的。周佛海对于自己在汪伪内处于掌实权地位甚为满意，认为汪精卫对他真是有知遇之恩的。

除了汪精卫、周佛海之外，其他附汪的人，也莫不是想攀龙附凤，做上大官。汉奸李士群常对他的部下说：“可以在河边摸大鱼，何必到河中心摸小鱼。我们都是没有根基的人，到重庆是同别人竞争不过的。蒋介石依靠英美，我李士群什么都没有，就依靠日本人，你说我是汉奸也好，流氓也好，反正我现在有的是钱，有的是力量。”

由此可见，这些人落水当汉奸，都是醉心于个人权势。

汪精卫集团为了达到与日本谋和的目的，从各个方面开展活动，不惜出卖国格人格和民族利益。首先对蒋介石施加压力。周佛海通过知名学者胡适等人，向蒋介石宣传和平。结果，都未为蒋所采纳。随着战争形势的发展，汪精卫等人求和的心情更为迫切。日军攻占南京之后，日本政府提出更苛刻的条件，汪精卫还要刚上任的行政院长孔祥熙签字。这时蒋介石去河南，没有蒋的点头，孔祥熙不敢同意。汪说：“假如我是你，一定签字，……你何必一定要问蒋。他是负军事责任的，不好表态，你签了字，他自然得承认。”

1937年11月5日，陶德曼往见蒋介石和财政部长孔祥熙，转达日本对蒋介石提出的条件：（一）承认伪满洲国；（二）内蒙独立；（三）在华北建立非军事区，成立新的亲日政权；（四）扩大上海非军事区；（五）停止反日，共同反共；（六）减低日货关税；（七）尊重外侨权利。对于日本所提条件，蒋介石表示不能正式承认，但对陶德曼表示：（一）可以将日本所提条件作为和平谈判的基础；（二）华北的主权完整和行政独立不得侵犯；（三）在和平谈判中自始即由德国任中介人。他还要求陶德曼和日本政府，对于谈判的情况和日本所提“条件”，要严守秘密，否则他的地位将会大为动摇以至下台。但是汪精卫、周佛海一伙，却毫无顾忌地要求蒋介石全部接受日本条件。12月6日，汪精卫在汉口主持召开国防最高会议，竭力主张接受日本的条件，会议通过决议，决定接受陶德曼的调停，实现中日和平，企图造成既成事实逼蒋介石承认。

1938年2月，以低调俱乐部一伙人为核心，在汉口成立了一个“艺文研究会”，以周佛海为总务总干事，其宗旨：“第一，要树立独立自主的理论，反抗共产党的笼罩。第二，要造成一个舆论，使政府可战可和。”汪精卫集团利用这个公开的“文化团体”，以雄厚的经费，拉拢一些不同情中共的文

化界人士。越是强调反共的人，拿钱就更多些。“艺文研究会”还在广州、西安、长沙、重庆、香港等地设分会，办报纸，出刊物。以后汪精卫逃出重庆，这些人连同他们所掌握的舆论工具，一起成为汪投敌活动的吹鼓手。

为了投降卖国，他们还大量制造舆论，周佛海当时是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他说：“我是相信抗战下去是要灭亡的，但宣传上却不能不鼓吹最后胜利”。“我是主张和平之门不全关的，但宣传却要鼓吹抗战到底”。“这是我顶痛苦的一件事”，内心矛盾极了。于是，他提出了所谓“科学和理性”的宣传方针，要大家“根据理性，运用科学，去认清事实，不可为盲目的感情所驱使”。在这种方针指导下，他们利用“艺文研究会”，办刊物，出丛书，连篇累牍地把中日战争说成是“科学战争”，把人民的抗日运动说成是一种“缺乏理智的感情冲动，表现为一哄而起的行为”。

到1938年10月广州、武汉失守前后，汪精卫集团既震惊于大中城市的陷落，又害怕中国共产党抗日力量的发展，他们公开对日求和乞降，并竭力攻击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游击战。广州沦陷的当天他接见路透社记者说：“如日本提出和议条件，不妨害中国国家之生存，我们可以接受之”。与此同时，汪精卫又连续发表文章，诬蔑抗战是“消耗民力”，共产党是假借抗战，“保存实力”，“颠覆政府”，并抓住国民党火烧长沙的错误，大做文章，攻击“焦土抗战”是要将“一切物资烧光”，“一切人的生命杀完”，使“大家都变成大贫”，汪精卫的那些追随者便紧跟而上，公开讨论所谓“和平”的文章，连篇累牍地发表。汪精卫的求和舆论理所当然地受到人们的谴责，但他仍然坚持自己的主张。

为了完全降日，汪精卫等人下决心逃出重庆。1938年11月27日，梅思平将重光堂秘密协议缝在西装马甲里，带回重庆向汪精卫等报告。汪精卫对协议内容没有意见，但对是否离开重庆意见不一：陈公博不赞成，而陈壁君极力主张走。在这期间，汪精卫一直心神不定，每天晚饭后总在院子里踱来踱去，一言不发，一个人陷入穷思极想的苦海中。但汪精卫在民族投降主义的泥坑里越陷越深，已经到了不能自拔的地步，同时也由于他始终反对共产党，对这次与共产党合作特别反对，终于下定决心，脱离重庆投入日本的怀抱。

汪精卫集团怕成群结伙的走，人太多会使人生疑，于是决定分散出逃。12月5日，周佛海以视察宣传工作为名，堂而皇之去昆明；陶希圣则以讲学为名，尾随而去。为了便于出走，汪精卫先把汪公馆雇用多年的女佣遣散。接着，又把国民党军委会去给他当侍卫队长的刘文焕支走。同时，为了使自已出走时轻装简从，汪夫妇先把他们两个在重庆南渝中学读书的幼子汪文悌、幼女汪文恂，连同细软财物，带去昆明，让他们转飞河内去香港，对外说是让这两个孩子去香港读书。12月6日，汪精卫决定出走的前两天，蒋介石到重庆。这是武汉失守后蒋第一次入川。这一下把汪精卫出走的计划打乱了。19日，汪精卫带了陈壁君、周佛海、陶希圣、曾仲鸣等人从昆明至河内。就这样，汪精卫一伙叛离了抗日阵营，汪精卫投降卖国活动进入了新的阶段。

22日，与汪精卫的逃亡遥相呼应，日本首相近卫发表了第二次声明，要“与中国的有识同忧之士携手，向建设东亚新秩序迈进。”一时谣传“汪精卫受了国民政府的密令，是和战两面工作的一个使者。”英美两国对此十分敏感，纷纷打听蒋介石是否有意与日媾和。这下子，叫蒋介石感到十分难堪，蒋介石斥责汪精卫“造谣”，撤销了他的副总裁职务，同时开除了他的国民

党籍，并指令戴笠立即派特务到河内暗杀汪精卫。

汪精卫住在河内一幢小洋楼内，深居简出，又有日本特务和越南军警保护，戴笠派去的6名特务在汪宅附近盘桓了3个多月，竟一直无法下手。

汪精卫以河内为据点，频频向重庆政府开展宣传活动。然而，出乎日寇的意外，尽管有汪精卫呼吁，重庆的汪派要人们不为所动，反而骂汪精卫是卖国贼。

虽然如此，蒋介石对汪精卫的活动仍十分头痛，大骂戴笠的特务无能。戴笠只好一再发电催促特务动手。于是特务们在一天晚上，摸黑翻墙跳进汪精卫住的小洋楼，直奔二楼的住房。他们原想冲进去，用利斧把汪精卫砍死，来个人不知，鬼不觉，谁知房门怎么也打不开，只好在门上劈了个小洞，用手电照着往里寻找。忙乱中，他们看见床底下钻着一个人，就连射数弹，眼看着这个人在血泊中趴下不动了才匆匆离去。

枪声惊动了防卫的军警，结果只有两人逃出，四名特务被捕。

消息传到重庆，戴笠高兴万分，急忙向蒋介石报功。谁想到，第二天听河内广播，才知汪精卫安然无恙，被打死的是汪的亲信曾仲鸣。原来，这天曾仲鸣的太太从外地赶到河内，汪精卫搬到另一个房间去，把他的大房间让给曾仲鸣夫妇住，曾仲鸣做了替死鬼。

汪精卫受了这样的惊吓，河内再也待不下去了，急忙绕道香港去了日本，直接投入了日寇的怀抱。

汪精卫集团出逃后，引起人们的普遍怀疑：在特务横行、耳目四播的国统区，如果没有蒋介石的默许，汪精卫能逃出重庆，安然抵达河内吗？连当时日本的一些人也对汪的意图表示不信任，认为“汪和蒋在唱双簧”，两人“是互相勾结在一起的。和平运动不过是缓兵之计。”甚至当时的日本的一些政府官员也有这种看法。至今仍然有人认为这是一个“尚未揭开之谜底”。

汪精卫出逃之前，他在国民党内地位仅次于蒋介石。他飞往昆明的飞机票，是由汪派的骨干、时任交通部次长的彭学沛代买的，当时国民党政府还没有建立民航检查机构。汪的这次行动又是极端秘密的，事先连他的亲侄儿、陈璧君的胞妹、曾仲鸣的胞兄以及他多年的老朋友、老部下如陈树人、甘乃光等都不知道。为此，陈璧君在临走时还问汪：“这样的大事，为何不与他们商量，他们留在蒋的罗网中，能不牺牲吗？”在当时，以汪精卫的地位，说要到昆明作抗战演讲，是没人敢予阻拦的。汪精卫逃到河内并发表了《艳电》之后，1939年1月1日，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开会，决议：“永远开除汪兆铭党籍”，并撤消其一切职务。但是，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在为汪精卫出走给各级党部的对内指示中，还对汪的行动表示“惋惜”，希望他能“翻然悔悟，重返抗战队伍”。先是，蒋介石派了汪派中央委员谷正鼎，传达中央意旨。同时，国民党中央社社长肖同兹，也奉蒋介石之命，去香港劝周佛海回重庆。这些争取工作无效之后，3月，谷正鼎又奉命带了汪精卫和陈璧君、曾仲鸣的3张出国护照去河内见汪，转达蒋介石的意见说：“汪先生如果对国事发表主张，写写文章，发发电报，任何时候都很欢迎。如果需要到海外疗养，可先送公费50万元，以后随时筹寄。但不要去上海、南京，不能另搞组织，免得被敌人利用，造成严重后果。”蒋介石的这些努力遭到汪精卫的拒绝。蒋介石知道，一旦汪精卫进一步投入日本帝国主义的怀抱，对他的统治地位是不利的。蒋是一个大独裁者，即使要谋求对日“和谈”，他也要独揽这个大权，决不会轻易把这项“重任”让汪精卫去完成，而削弱自己

的统治地位。

汪精卫投敌之后，他在解释自己为什么要逃离重庆，反复强调说，他不离开重庆就不能公开发表自己的“和平”主张，《艳电》就不能发出。周佛海公开否认他们的“和平运动”是蒋汪“演的双簧”，也不承认他是蒋介石派来“暗中监视”汪精卫的。相反，他对自己不得不叛离蒋介石感到内疚。他说：他十分感激蒋介石对他的提携与重用。他虽然没有反蒋的居心，但因为政治主张不同，事实上不能不处于对立地位，在私情上是十分难受的。

另一方面，汪精卫集团的投敌与蒋介石是有很大关系的。可以说是蒋介石为汪精卫集团的投敌铺平了道路。

抗战初期汪精卫“和平派”之所以能够活动，是与蒋介石的抗战两面政策分不开的。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的全面侵华战争、不仅使中华民族面临着生死存亡的严重关头，而且也危及蒋介石的统治地位，因此，蒋不得不对日军的进攻实行了抵抗。抗战初期，国民党政府的对日作战是比较努力的，它投入相当多的部队到抗日第一线，有几个战役都打得很激烈。但是，蒋介石的抗日是被迫的，动摇的，他在实行抗日的同时，并没有放弃与日本妥协的企图。他多次表示：“我们的态度只是应战，而不是求战，应战是应付最后关头必不得已的办法。”还说：“在和平根本绝望之前一秒钟，我们还是希望和平，希望以外交方式，求得芦沟桥事件的解决”。蒋介石的这种抗战两面政策，为汪精卫“和平派”的活动开了方便之门。因此，汪精卫、周佛海等人才敢于当面对蒋劝和，才能够在陶德曼调停中参与策划，穿插其间。

派高宗武去香港寻找“和平路线”，如果没有蒋介石的亲自批准，高宗武作为国民政府一个高级外交官员，怎能秘密去香港、上海与日本勾搭？蒋介石还每月从军事秘密费中拨给高宗武活动费6000元（合约2000美元）。高宗武从日本方面摸到的情况，都通过陈布雷转交蒋介石过目。1939年，蒋把高宗武送上来的报告，放在办公桌上足有3天，以备随时考虑。以后，汪精卫集团就是沿着高宗武开辟的这条路线暗中通敌，以至叛国。

“艺文研究会”是由周佛海、陶希圣策划，经蒋介石批准成立的，蒋还“面命”该会要受汪精卫的“指导”。其经费每月5万元，是由蒋介石下手谕从军事特别支出内拨给的，这在抗战时期，没有哪一个文化团体能有这样“优越”的条件。周佛海、陶希圣就是利用雄厚的经费，招兵买马，出刊物，办报纸，开书店。蒋介石对“艺文研究会”的反共、求和言论听之任之，这就为汪精卫集团投降理论的散布，为这个投降集团的拼凑，大开方便之门。

然而，蒋介石毕竟不同于汪精卫。对于谈和的条件，蒋介石的要价要高些，他不仅要求恢复芦沟桥事变前的状况，而且不肯公开承认满洲国。汪精卫集团则认为，能够从日本手里收回黄河以南地方已经算满足了，连黄河以北，甚至东北都想收回，谈何容易！他们甚至说：“中国以前何尝有东三省，奉天本来是满洲的嫁妆。他们现在不过把自己的嫁妆带回去就是了，有什么理由反对呢？”汪精卫直到出逃前几天，还在逼蒋介石谈和。

蒋介石、汪精卫之间，既有一致又有区别。当他们利害关系一致，他们就互相勾结互相利用。但是他们又是国民党内两个最大的政治派别，自始至终不可能真正地合作。同时，蒋汪两人又都是权力迷，为了争权夺利，他们长期以来一直在勾心斗角。蒋汪之间矛盾的深刻和尖锐是难以调和的。

汪精卫原以为凭自己在国民党内的历史、地位与声望，只要他振臂一呼，大大小小的投降派汉奸就会源源而来。但是，他打错了算盘。《艳电》一发

表，立即受到全国人民一致的谴责，一个反汪的巨大声浪席卷全国，人们坚决要求“宣布其罪，通缉归案，以正国法，而定人心”。汪精卫寄予莫大希望、估计可能参加“和平运动”的西南地方实力派陈济棠、张发奎及龙云等人没有附和响应，而且还纷纷发表通电，要求国民党“下令通缉归案，明正典刑，以肃纲纪而振士气”。就是一向被人视为汪派重要干部的陈树人、谷正纲、彭学沛、甘乃光等也不来参加汪精卫的叛国集团。汪精卫集团如同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处于极端孤立的地位。

1939年5月31日，汪精卫同周佛海、梅思平、高宗武等，乘日本海军飞机到达日本，直接进行卖国交易。6月6日，日本内阁五相会议决定《建立新中央政府的方针》。方针规定：（一）中央政府由汪精卫、吴佩孚和临时、维新两政权以及改组后的重庆政府等方面组成；（二）中央政府根据《调整日华新关系的方针》与日本正式调整国交，其成员应事先接受上述原则；（三）中央政府必须具备人的因素和基本力量，成立日期由日本决定；（四）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关系，以分治合作为原则。（五）关于国民党和三民主义，在不妨碍亲日、满和反共原则下，可允许存在。16日，日本五相会议对汪精卫提出的《关于收拾时局的具体办法》做出决定：（一）中央政府的名称和首都，由中央政治会议来决定；（二）国旗如采用青天白日旗时，须在旗帜上的下面附上一块三角形黄布片，上写“反共和平”等字样；（三）关于废除临时和维新两政府，须理解只取消其名称。对两政府与日本签订的协定及其他决定，中央政府必须继承；（四）建立中央政府要特别考虑具有人的要素和基础实力；（五）对于国民党政府与外国签订的条约和协定，中央政府应按日华新关系的方针，宣布予以废除和修改。

在东京期间，汪精卫还分别与日本首相平沼、陆相板垣、和外相有田等举行了会谈，汪精卫在取得日本五相的“信赖”和支持以后，于1938年6月18日，离日回国，开始他组建伪中央政府的活动。

1939年8月18日，汪精卫在上海秘密召开伪国民党第六次代表大会。出席会议的有各地代表共240余人。汪精卫担任大会临时主席，周佛海为大会主席团主席，褚民谊、梅思平、丁默屯、陶希圣、高宗武、陈璧君等为副主席，梅思平为秘书长，罗君强、陈春圃为副秘书长。

会议通过了（一）“党务整理案”，规定：自1939年1月1日以后，重庆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会的决议、命令全部无效；改组中央及地方机关；修正国民党总章，废除总裁制，实行主席制；选举中央委员会，推汪精卫为中央委员会主席。（二）修改国民党政纲、废除一党专政，授权汪精卫与党外人士组织中央政治会议，准备还都南京。（三）以反共为基本国策。（四）根本调整中日关系，迅速恢复国交。（五）迅速召集国民大会，实施宪政等提案。会议宣布以“和平反共建国”为投敌卖国的纲领。

9月5日，伪国民党召开六届一中全会，正式宣布成立了伪中央党部，以汪精卫为党中央委员会主席。陈公博、周佛海、梅思平、林柏生、丁默屯、陶希圣、高宗武、焦莹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陈璧君、顾忠琛、褚民谊等为中央监察委员会常委；褚民谊为秘书长，陈春圃、罗君强为副秘书长；梅思平为组织部长，戴英夫、周化人为副部长；陶希圣为宣传部部长，林柏生、朱朴为副部长；丁默屯为社会部部长，汪曼云、顾继武为副部长；周佛海为财务委员会主任委员兼特务委员会主任委员，丁默屯、李士群为特务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特务委员会设特工总指挥部和肃清委员会。丁

默屯为特工部主任，李士群、唐惠民为副主任。肃清委员会由周佛海兼主任，丁默屯、李士君兼副主任。

伪国民党“六大”的召开，是汪精卫筹组伪政权的一个重要步骤。此后，汪精卫便以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主席的身份，开始了一系列组建伪中央政府的活动。

11月1日，汪精卫集团与日本在华特务组织“梅机关”在上海举行秘密会谈，12月30日，秘密签订了《日华新关系调整要纲》，以出卖国家的领土主权为代价、来换取日本帝国主义对其成立伪政权的支持。而日本的兴亚院和内阁会议，在《要纲》密约签订一周后即予批准，并表示将全力支持汪精卫中央政府的成立。

在“梅机关”的一手操办下，1940年1月，汪精卫与王克敏、梁鸿志等在青岛几次举行了合流的分脏会谈，经过讨价还价，通过了中央政府大纲、政纲、政府名称、国旗、首都和成立的日期等案。3月20日至22日，伪中央政治会议在南京举行，完成了伪政权成立的全部准备工作。

1940年3月30日，在日本特务组织“梅机关”长官影佐祯昭一手导演下，伪国民政府在南京正式成立。汪精卫及伪国民政府各院、部、会主要人员陈公博、周佛海等宣誓就职。汪精卫在就职典礼上宣读了《还都宣言》。声称：本政府为全国“唯一的合法的中央政府”，“实现和平实施宪政，为国民政府所执行之最大方针”；对于日本，要“本于善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提携之原则，以扫除过去之纠纷，确立将来之亲善关系”；对于重庆方面，“如仍对内发布法令，对外缔条约协定皆当然无效”；对于现在重庆及各地服役中之公务人员，“务须于最近期间，回京报到”；凡属一般将士，“务必一体遵守，即日停战，以期待命”。

汪伪国民政府，在“继承法统”的口号下，其组织机构完全采用了国民党政府的组织形式。国民政府之下设五院，汪精卫任国民政府代主席兼行政院院长，立法院院长陈公博，司法院院长温宗尧，监察院院长梁鸿志，考试院院长王揖唐（未到任），副院长代理院长江亢虎。其中行政院又设内政、外交、财政、军政、海军等14个部。其地方政权机构主要有：华北政务委员会，江苏、浙江、安徽、湖北、广东等省政府，及南京、上海、汉口3个特别市政府。还有一个以徐州为中心包括22个县的“苏淮特别行政区”后改为淮海省。

此外，汪伪政权还设有庞大的中央和地方军事机构。它的最高军事指挥机关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由汪精卫充任，下设办公厅、参谋本部、军事参议院和军事训练部等。其先后成立的地方军事机构有：苏浙皖三省绥靖军总司令部，总司令任援道，参谋长黄其兴；武汉绥靖主任公署，公署主任叶蓬，参谋长萧其昌；开封绥靖主任公署，公署主任刘郁芬，参谋长刘希文；苏豫边区绥靖军总司令部，总司令胡毓坤，副总司令张岚峰，参谋长潘伯豪；华北绥靖军总司令部，总司令齐燮元；闽粤边区绥靖总司令部，总司令黄大伟。另外，还设有军事委员会委员长驻广州办事处，以李讴一为主任。当然，这些军事机构，随着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政策的变化和战争形势的需要，曾经几次变动，特别是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侵略军为加紧推行“以华治华”的策略，加强伪“中央机关之统率力，其统帅之纯一化，以适应战争勃发的需要”，对汪伪政权的军事机构进行较重大的调整。

汪伪政权是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战争的产物，是作为日本推行侵华政策的

工具而存在的傀儡政权。

随着投降风潮日涨，国民党顽固派反共气焰也日益嚣张。他们制造事端，制造摩擦，给英勇抗战的八路军、新四军造成极大的困难。那些投敌的伪军并不与蒋军为敌，却处处配合日军和蒋军进攻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部队，协助国民党军队掀起了反共高潮。汪伪政权出台不久，1941年1月，发生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新四军在转移途中，遭到国民党顽固派的进攻。8000余人伤亡被俘，军长叶挺负伤被俘，副军长项英遇害。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部队抗击着大部日军和几乎全部的伪军，还要与国民党顽固派斗争，处境变得十分险恶。

汪伪政权，为了效忠其主子，对我广大沦陷区人民，实行残酷的政治统治和经济掠夺，并且协助日本侵略军进攻抗日政权，特别是签订秘密条约，出卖国家民族利益，犯下了滔天罪行。

汪伪政权成立之前，为取得日本帝国主义对它的支持，就以国家主权为代价，对日本侵略者作了许多秘密“承诺”，其中主要的是1938年11月20日签订的“上海密约”和第二年12月30日秘密签订的《日华新关系调整要纲》。《要纲》的主要内容是：东北割让给日本，把蒙疆、华北、长江下游和华南岛屿，定为“日华强度结合地带”，由日本长期占领；伪政权自中央政府至地方政府，都由日本顾问或职员监督；伪军和伪警察，由日本教官训练，武器亦由日本供给；伪政府的财政经济政策、工业、农业、交通等，都由日本控制，一切资源，由日本任意开发；禁止一切抗日活动等。

汪伪政权成立后，按照日方旨意，于11月30日，由汪精卫、阿部信行，在南京签署了《中日基本关系条约》。这个条约，完全是以日本近卫首相提出的“三大原则”为基础，以《日华新关系调整要纲》的内容为标准、而签订的公开卖国条约。比如：条约在“两国共同防共”的口号下，把日本侵略军对我华北和内蒙地区的侵占永久化；条约在“为确保两国共同利益”的口号下，又规定日本“在所要期间内”“得驻留其舰船部队于长江沿岸特定地点并华南沿岸特定岛屿及其关联地点”，而且“日本国舰艇得自由出入并碇泊于中华民国领域内之港湾水域”。另外，条约还允许日本任意开发“华北及蒙疆之特定资源，尤其国防上必要之埋藏资源”。并且在这些资源的利用上，应“予日本国及日本国臣民以充分之便利”。可见，所谓《中日基本关系条约》，实际上就是帝国主义与殖民地附属国的关系条约。

汪伪政权在帮助日本侵略军对敌后抗日根据地进行残酷扫荡的同时，在沦陷区又进行所谓“清乡运动”，企图借以肃清敌伪占领区的抗战势力，巩固其对占领区的统治。

日本侵略军的“清乡”计划，早在1940年冬就提出来了，并得到汪伪政权的积极响应和配合。1941年3月24日，汪伪中央政治委员会第四十一次会议，成立了清乡委员会，通过了《清乡委员会临时组织大纲》。特派汪精卫兼任清乡委员会委员长，陈公博、周佛海兼清乡委员会副委员长，李士群兼清乡委员会秘书长，汪曼云任副秘书长，陈群等14人为清乡委员会委员。具体指挥机构是“驻苏州办事处”。

根据日汪“分期分批进行清乡”的计划，从1941年7月，苏州地区就开始了“清乡”；1942年8月，清乡地区又扩大到太湖东南地区和上海市郊区；1943年，清乡地区又扩展到江苏的镇江地区、浙江的杭州地区和苏北地区；1944年，安徽的芜湖地区，湖北和广东的个别县也进行过“清乡”。

上述地区，多为我国最富庶的地区之一，日本侵略者为了掠夺军用物资，实行“以战养战”的战略，对这些地区的清乡运动与对华北地区的残酷扫荡，在作法上并不完全相同，不是采用残酷的摧毁政策，而是采用所谓军事清乡、政治清乡、经济清乡、特务清乡、文化清乡以及心理与精神清乡等，使沦陷区人民遭受日伪各种各样的摧残与折磨，妄图通过镇压与欺骗的清乡运动，动摇人民群众的抗日意志，消灭人民的革命力量，以巩固其对占领区的统治。

汪伪政权还通过发行伪币和统制物资手段，大量搜刮民财和粮食、棉布等“战时物资”。

1941年1月6日，伪“中央储备银行”在南京正式成立，由伪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周佛海任总裁。这是汪伪政权以金融为工具，残酷掠夺沦陷区人民的一项重要措施。中央储备银行成立时，发行的中储券与国民党的法币等价使用，但在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日本政府为了使中储券成为敌占区的“唯一法定通货”，破坏中国抗战经济，乃决定对法币采取打击政策，限期贬值兑换直到停止使用。仅此一项就给沦陷区人民带来了无穷的灾难，汪伪政权的大小汉奸们，利用不等价的掠夺，从人民手中攫取了大量财富。

汪伪政权还加强对敌占区物资的统制，以种种借口，罚款、没收甚至公开抢劫人民手中的物资，稍有违抗，即惨遭毒打。汪伪政权还以“参战”动员为借口，开展为日本“献金购机”和搜集废旧金属运动，限额勒索民间的财物，奉送日军购买飞机之用。

此外，汪伪政权依靠以李士群为头子的特务组织和特务武装进行法西斯特务统治。李士群亲自兼任清乡委员会的秘书长，直接配合日军对沦陷区进行“清乡运动”，同时加强对敌占区的恐怖统治，残酷镇压革命人民的抗日活动。

1944年，随着整个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发展，日本帝国主义在东方发动的侵略战争败局已定，它的傀儡汪伪政权日子也不长了。11月10日，汪精卫死于日本名古屋帝国大学附属医院内。12日，伪中央政治委员会推选陈公博为行政院长，代理国民政府主席。他看到大势已去的危局，对心腹说：“汪先生上演的这台戏，已近尾声，所谓人亡政息，应该结束了，我来继承这个烂摊子，是来办理收场的，不是来继续演出的”。

陈公博、周佛海等一群汉奸，忧心忡忡，为即将覆灭的汪伪政权赶办后事。一方面，他们积极协助并希望日本对蒋介石的诱降成功，使两个“国民政府”“合并”起来；另一方面，加紧军事部署，加强南京、上海、杭州一带的军事守备力量，反对和防止八路军、新四军进攻和收复这些地区，以便向蒋介石报功，减轻他们的罪行。

蒋介石对汪伪政权的态度是十分矛盾的，他一方面谴责汪精卫卖国求荣，一方面对投敌官员睁只眼闭只眼，有时还与汪伪政权藕断丝连，拉拉扯扯；蒋介石还把投敌叛国叫做“曲线救国”，为大小汉奸留下了一条活路。

汪精卫虽然有过革命的历史，却终究当了汉奸，成了中华民族的罪人。

重 庆 谈 判

八年抗日战争过程中，国共两党的统一战线虽然受到过挫折和干扰，但是终究是合作到底了，两党都为抗战胜利作出了贡献。然而蒋介石却想消灭抗战有功的人民军队。

抗战胜利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已发展到 120 多万。还有民兵 260 多万，控制着从东北到华南的很多土地。它在全国人民心目中已经树立了崇高的形象，它的力量远不是八年前几万人所能比的，已经成为中国一支不容忽视的政治力量。要想消灭这样强大的力量是不可能的。

摆在蒋介石面前唯一正确的办法是：继续和共产党合作，结束独裁统治，成立联合政府，共同建设中国。然而，他不愿意也不甘心看到共产党如此强大，还在作当年“围剿”红军的梦。

1945年8月，日寇宣布投降，使善于保存实力的蒋介石一下子陷入了尴尬处境：长期与日寇对峙并包围着敌军据点和交通要道的八路军、新四军和国民党杂牌部队在受降中处于极其有利的地位，而退缩在中国西南部和缅甸丛林中的蒋介石嫡系部队，除非从抗日部队头上爬过去摘取抗战胜利果实，否则，东部广大富庶地区势必落入共产党军队的手中。蒋介石气急败坏。于8月10日晚间发出训令，命令日军不许就近向八路军、新四军抗日部队投降，原地维持秩序，等待“中央军”前往受降。11日，蒋介石连下三道命令，一道命令给嫡系部队，要其“积极推进，勿稍松懈”；一道命令给伪军，要其“维持治安，乘机赎罪”；一道命令给八路军，要其“就地驻防待命，不得擅自行动”。

8月15日，重庆政府宣称：任何不服从蒋委员长命令的抗日部队，将被认为“人民公敌”，并应以军事纪律处分。

这些事实表明，抗日战争胜利后的中国，将会有一场大的斗争，中国的前途如何，是摆在全国人民和各派政治力量面前的最大问题。

蒋介石的决心是要用武力消灭共产党。可如果立即发动内战，就会处在不利的地位，国际国内各界人民迫切要求和平，反对中国内战，中国共产党坚决反对内战、独裁政策；同时国民党军队远在大后方，发动全面内战尚需时间准备，而美国慑于世界人民包括美国人民反对支持蒋介石发动内战的舆论压力，在帮助蒋介石调兵的同时，也希望国民党和中共谈判。于是，国民党一面积极准备内战，一面伪装和平，要求与共产党谈判。

邀请毛泽东去重庆进行和平谈判，是蒋介石玩弄政治欺骗手法的重要一招。1945年8月14日、20日和23日，蒋介石连发三电邀请毛泽东赴渝面商“国家大计”。他的阴谋是：如果毛泽东同意去，一则可能对中国共产党施加压力，逼迫中共交出军政和解放区，二则可以争取时间，加紧运兵，部署内战。如果毛泽东不去，他就可借以欺骗中国人民和世界舆论，诬蔑共产党反对和平谈判，把内战的责任强加在中国共产党身上。

中共中央洞悉蒋介石的上述阴谋，但是为了尽最大努力争取和平民主和捍卫人民利益，更有效地揭露美蒋反动派的真面目，以教育群众和争取中间派，仍决定派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赴重庆谈判。

8月25日，中共中央发表了《对于目前时局的宣言》，提出和平、民主、团结三大口号和在和平民主团结的基础上，实现全国统一，建立独立自由富强的新中国的方针，并针对国民党反动派阴谋发动内战，破坏团结，压制民

主的活动，向国民党政府提出六项紧急措施。其主要内容是：

（一）承认解放区的民选政府和抗日军队，撤退包围与进攻解放区的军队，以便立即实现国内和平，避免内战；

（二）划定八路军、新四军及华南抗日纵队接受日军投降的地区，并给予他们以参加处置日本的一切工作的权利，以昭公允；

（三）严惩汉奸，解散伪军；

（四）公平合理地整编军队，办理复员，救济难胞，减轻赋税以苏民困；

（五）承认各党派合法地位，取消一切妨碍人民集会、结社、言论、出版自由的法令，取消特务机关，释放爱国政治犯；

（六）立即召开各党派和无党派代表人物的会议，商讨抗战结束后的各项重大问题，制定民主的施政纲领，结束训政，成立举国一致的民主联合政府，并筹备自由无拘束的普选的国民大会。

8月26日，中共中央向党内发出《关于同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的通知》，告诉全党，毛泽东将应蒋介石电邀赴重庆同国民党当局进行谈判，并说明了党中央关于和平谈判的方针，要求全党不要因为谈判而放松对蒋介石的警惕和斗争。特别告诫粤、湘、鄂、豫等省解放区的党组织，“绝对不要依靠谈判，绝对不要希望国民党发善心，它是不会发善心的。必须依靠自己手里的力量，行动指导上的正确，党内兄弟一样的团结和对人民有良好的关系。坚决依靠人民，就是共产党的出路。”

8月28日，毛泽东和周恩来、王若飞，在赫尔利、张治中陪同下由延安飞抵重庆。毛泽东离开延安时，延安各机关团体代表数百人到飞机场热烈欢送。当日下午3时45分，毛泽东一行抵达重庆九龙坡机场。在机场上欢迎毛泽东的有：蒋介石的代表周至柔，国民参政会秘书长邵力子、副秘书长雷震，民主同盟主席张澜以及其他著名人士沈钧儒、左舜生、章伯钧，陈铭枢、谭平山、黄炎培、冷御秋、郭沫若和第十八集团军驻重庆办事处的代表，以及中外记者数十人。毛泽东在机场发表了书面谈话，指出：“目前最迫切者，为保证国内和平，实施民主政治，巩固国内团结。”“希望中国一切抗日政党及爱国志士团结起来，为实现上述任务而共同奋斗”。

毛泽东等到达重庆的消息，震动了全国。重庆的各阶层人民热烈欢迎，奔走相告，使整个山城沉浸在欢乐之中，把争取和平的希望寄托在中国共产党身上。舆论界说：“这是一个比日本突然宣布无条件投降更使人欢喜的消息”，称颂毛泽东“维系着中国目前和未来历史和人民的幸福。”

称赞毛泽东的伟大气魄和惊人胆略；盛赞中国共产党谋求和平民主团结的诚意。

毛泽东赴重庆谈判，完全出乎美蒋意料之外。蒋介石对谈判毫无准备，一切提案都由中共代表提出。谈判中，蒋介石除了反复强调政令统一外，提不出任何新的具体的办法，中共代表却表现出极大的忍让和耐心。

中共先提出中央政府应承认解放区政府的合法地位。蒋介石表示全国政令必须统一，解放区必须取消。

中共作出让步，表示为谋政令统一，请重划省区，解放区原有地方政府官员名单，呈请中央政府加委。蒋介石还是坚持先统一政令，后考虑任用行政人员。

中共再作让步，请国民政府在陕甘宁和华北五省委中共推荐之人为省主席及委员，于绥远、河南等11省，平、津、青、沪四特别市委任中共推荐之

人为省政府副主席和副市长，于东北各省容许中共推荐之人参加行政，因为这些地区中共有广大解放区。蒋介石还是说这是妨害“军令政令之统一”。

中共再退一步，请委省主席的减为陕甘宁和华北四省，请委副主席、副市长的减为二省三市。蒋介石仍不答应。

中共让步，请在派员监视之下，在解放区实行选举，然后请中央政府加委。蒋介石却不准民选，称“须待宪法颁布”。

中共再让一步，各解放区维持现状，待宪法颁布后再行选举任命，蒋介石仍然不答应。总之，他要立即取消解放区及其民选政府。这是中国共产党无法接受的。

谈判表明，蒋介石集团对于谈判毫无诚意，提不出任何方案来，只是派了王世杰、张群、张治中和邵力子等 12 个代表与中共应付。谈判一开始，中共即将《谈判要点》11 项面交国民党代表转蒋介石，其要点是：确定和平建国方针；承认各党派合法平等地位并长期合作；承认解放区政权和抗日部队；严惩汉奸，解散伪军；重划受降地区；停止一切武装冲突；实行政治民主化和军队国家化。国民党对中共提的 11 项“要点”以“距离太远”拒不接受，致使会谈一度陷于僵局。中国共产党为了力争和平，促成谈判达成协议，继续提出了一系列建议，作了重要让步，从而粉碎了国民党的造谣污蔑，揭穿了国民党的内战阴谋，赢得了全国人民和民主党派的热烈赞同和支持。

在谈判期间，毛泽东、周恩来等还多次会见了支持中国人民革命事业的宋庆龄，并和各党派、各界代表人物及外国友好人士进行了广泛的接触和交谈。向他们解释了中国共产党关于实现和平、民主、团结的基本方针，表明了共产党对和平谈判的诚意。这就争取了许多人士对共产党的同情和支持，形成了一股反对蒋介石内战独裁，要求和平民主的强大舆论力量，推动着重庆谈判利于人民的方向发展。

经过 43 天的会内会外斗争，于 10 月 10 日，由周恩来、王若飞和王世杰、张群、张治中、邵力子代表双方签署了《国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确定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承认“以和平、民主、团结、统一为基础”，“坚决避免内战，建设独立，自由和富强的新中国”；国民党应迅速结束训政，实施宪政；召开有各党派代表及社会贤达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保证人民享受“身体、信仰、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之自由”，“严禁司法和警察以外的机关有拘捕、审讯和处罚人民之权”；承认国民党、共产党及一切党派的平等合法地位；释放政治犯；“积极执行地方自治，实行由下而上的普选”，等等。关于解放区政权、解放区军队以及国民大会等问题，虽然中共一再让步，但均被国民党拒绝，未获协议，留待以后由政治协商会议和国共双方组成的三人小组进一步磋商。

关于解放区军队问题，中国共产党作了必要的让步，提出“应公平合理地整编全国军队”。把人民的军队缩编成 48 个师，占国民党军队 263 个师的六分之一。国民党不同意，中共代表又提出缩编到 43 个师，占七分之一。国民党说，它的军队要缩编到 120 个师。中共代表说，照此例减下去，人民的军队可以缩编到 24 个师，还可以少到 20 个师，还占七分之一，并表示广东、浙江、苏南、皖南、皖中、湖南、湖北、河南（豫北不在内）八个地区的抗日军队可以迅速着手复员，并从上述地区，逐步撤退应整编的部队至陇海路以北及苏北、皖北的解放区集中。但是，国民党反动派根本否认人民军队的合法地位，对中共的整编方案以“可以考虑”为幌子，实际上加以否定。

关于国民大会，中共主张取消抗日战争前国民党包办产生的国大代表，修改国民党制订的国民大会组织法、选举法和宪法草案。国民党方面也表示不能接受。关于受降权问题，中共提出重划受降地区，参加受降工作的要求。国民党实际上拒绝了中国共产党的正确意见。

10月11日，毛泽东返回延安。17日，在延安干部会议上作了《关于重庆谈判》的报告，报告指出了这次谈判的收获是国民党承认了和平团结的方针和人民的某些权利，这是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斗争的胜利。报告提出了对《双十协定》应抱的态度，即不要轻信蒋介石的诺言，已经达成的协议，只是纸上的东西，纸上的东西不等于现实的东西。同时也提出了今后的任务，是坚持《双十协定》，继续争取和平，如果国民党要打，就把他们彻底消灭。

重庆谈判和《双十协定》虽然在许多重大问题上，没有能够达成协议，但仍然具有重大意义。中国共产党通过这一斗争，用事实表明了自己争取和平的诚意，有力地揭穿了蒋介石的内战阴谋，从而极大地争取了群众，使自己在政治上处于十分有利的地位。而蒋介石则陷入了被动、孤立的困境。

《双十协定》签订后，中国共产党忠实地按照自己同意的协议，将江南部队撤往江北，再一次用实际行动向全国人民表明了自己坚持和平团结的诚意。但是，国民党却把谈判和这些协议当作掩护他们发动内战的手段。还在毛泽东等到达重庆的第二天，即8月29日，何应钦就下令国民党各战区大量印发蒋介石1933年编写的《剿匪手册》。与此同时，国民党反动军队大批运至内战前线。10月13日，蒋介石就向国民党军队发布了内战密令。在他的密令下，国民党军队分路向解放区发动了猖狂的进攻。

早在9月初，国民党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就在蒋介石的密令下，集中13个师的兵力，并勾结日伪军，分两路沿同蒲路向解放区进犯。一路由临汾、浮山、翼城等地进逼晋东南的上党地区。另一路从太原、榆次出发，对太岳、太行根据地进行了疯狂的“扫荡”。晋冀鲁豫野战军在刘伯承、邓小平领导下，奋起自卫还击。从9月上旬至10月上旬，共歼敌3.5万余人，俘敌军队、师长等高级军官多名，缴获大量武器及其他军用物资，彻底粉碎了敌军的进犯。

国民党第十二战区傅作义部，在8月至9月上旬，勾结敌伪军先后占领集宁、丰镇、兴和等战略要地，并向刚被解放的张家口地区进犯。10月中旬，傅作义集中其主力10万余人，由集宁、丰镇全线出动，企图一举攻占张家口，沿平绥线东进北平。晋绥和晋察冀部队在贺龙和聂荣臻指挥下，经过半个多月的激战，击退了傅作义的进犯。从10月20日至11月5日，逐次恢复了被其占领的集宁、丰镇、和林等地，歼敌1.2万余人，傅作义部进犯张家口的计划被粉碎。

国民党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胡宗南和十一战区司令长官孙连仲部，这时也向晋冀鲁豫地区进犯。从9月12月到10月7日，连陷封邱、延津、原武、武涉四县城及部分乡镇。10月中旬敌集结20余万兵力，由郑州、新乡沿平汉线北上，10月下旬，进犯邯郸地区。与此同时，国民党第十六军在日伪军配合下，由石家庄沿平汉路南下，造成对解放区南北夹击的局面。晋冀鲁豫野战军，在刘伯承、邓小平指挥下，奋起自卫，经过激战，于10月25日收复磁县，并将国民党新八军、四十军、三十军全部包围。在解放军强大的政治攻势和劝降下，也由于蒋介石内战政策不得人心，10月30日，被蒋介石视为“杂牌”的新八军军长（十一战区副司令）高树勋将军率领全体官兵万余

人，举行反内战起义。十一战区副司令兼四十军军长马法五、副军长刘世果及师长以下官兵 2 万余人被迫放下武器。在这次战役中，解放军毙俘国民党军 1.4 万余人，缴获大量美制枪炮弹药及多种重要文件，完全粉碎了敌人对平汉线北段和邯郸地区的进犯。

解放区自卫反击战，取得了歼敌 9 万余人的胜利，沉重打击了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的阴谋，密切配合了重庆谈判，促进了《双十协定的签订和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

鉴于国民党的内战政策不得人心，独占胜利果实又困难重重的现状，美国总统杜鲁门于 1945 年 12 月 15 日发表对华声明，表示赞成中国“召开全国主要政党代表会议，以谋早日解决目前的内争”，并派马歇尔来华调解国共军事冲突。26 日，苏、美、英三国外长莫斯科会议发表了公报，重申了坚持不干涉中国内政的政策，并认为“国民政府各级机构中民主党派之广泛参与以及内部冲突之停止，均属必要。”27 日，中共代表以无条件停止战争办法书面提交国民党政府代表。国民党由于全面内战的准备尚未就绪，并由于苏、美、英对中国问题的态度，不得不表示同意谈判停战问题和召开政治协商会议。

12 月 16 日，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出席政治协商会议的代表团抵渝。中共代表团认为，无条件地停止国民党的军事进攻，是召开政协的前提条件。并向国民党政府提出了立即停战的建议。国民党当局为求缓兵之计，也同意此项建议而开始国共双方、并有马歇尔参加的停战谈判。到 1946 年 1 月 10 日，双方达成协议，签订了《停战协定》，并于同日下达了自 1 月 13 日午夜生效的停战令。《停战协定》规定，国内一切军事冲突和军事调动一律停止，并组成由共产党、国民党和美国政府三方代表参加的“三人小组”和“军事调处执行部”（设在北平），以监督停战协定执行。中国共产党派周恩来参加“三人小组”，叶剑英参加“军事调处执行部”。1 月 10 日晚，中共中央向解放区各部队发布了严格执行停战协定的命令，解放军忠实地执行了这一命令。但是，蒋介石在美国授意下，坚持在《停战协定》中将东北除外，其目的是一方面在东北放手大打，另一方面便于部署内战兵力，然后将战火烧向关内。蒋介石在下达停战命令的同时，还密令其军队迅速“抢占战略要点”，中国共产党代表在谈判中对此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揭露了美蒋反动派的阴谋。

在发布停战命令的同一天，即 1 月 10 日上午，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开幕，参加会议的各方代表共 38 人，共产党有周恩来、董必武、王若飞、叶剑英、吴玉章、陆定一、邓颖超等 7 人。国民党有孙科、王世杰、邵力子、张群等 8 人。民主同盟有张澜、罗隆基等 9 人。青年党有曾琦、陈启天等 5 人。无党派人士有郭沫若、王云五等 9 人。参加会议的代表，就其成份来看，基本上分为左、中、右三个政治集团，共产党属于左的方面，国民党和青年党属于右的方面，民主同盟和无党派人士基本上属于中间集团。这三个方面反映着不同的阶级要求，代表着不同的阶级利益，在政治协商会议上形成一场尖锐复杂的斗争。

斗争的焦点，仍然是军权和国家政权问题。国民党和青年党提出所谓先实行“军队国家化”，然后实现“国家民主化”的反动主张。目的是取消人民军队，以继续维护国民党的反动统治。中国共产党对此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主张要实行“军队国家化”，必须先实现“国家民主化”。中间势力

对蒋介石“你交出军队，我给你民主”的欺骗抱有幻想，有的则主张国共双方都交出军队，由他们代表国家来接受和领导军队，经过左、中、右三种势力的激烈斗争，最后通过了关于和平建国的纲领、关于军事问题、关于宪法草案问题、关于政府组织问题、关于国民大会问题等五项协议。这些协议实际上否定了国民党一党专政、独裁制度和内战政策，对人民是有利的。

政协决议得到了全国人民的欢迎。但蒋介石却因政协决议有损于他的独裁统治，便处心积虑地进行破坏，在政协开会期间，蒋介石不断指使特务捣乱会场，非法搜查政协代表的住宅。政协会议后的2月10日，国民党特务就在重庆较场口破坏庆祝政协成立大会，并殴打了大会主席团郭沫若、李公朴及新闻记者60余人，制造了较场口事件。21日，国民党北平当局指使特务捣毁了《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3月1日至17日，国民党召开六届二中全会，改变了政协关于修改宪章草案的原则，从根本上推翻了政协决议。三月底，国民党反动派又破坏了“东北停战”协议。4月，蒋介石又公开表示不能承认政协会议及其决议。之后，国民党政府就在美国指使下，向解放区发动了猖狂的进攻。5月下旬，侵占了四平、长春、永吉等城市，形成“关外大打，关内小打”的局面。所有这些，清楚地说明，蒋介石已经完全撕去了他的假面具。公开向全国人民宣战。

政治协商会议所以能达成有利于人民、不利于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几项协议，是中国共产党向国民党反动派进行针锋相对斗争的结果。这次会议对于扩大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孤立美蒋反动派，教育人民群众，提高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威信，产生了巨大的作用。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肆意撕毁政协决议，发动内战，只能使它在全国人民面前进一步暴露其反动面目，而招致人民群众的谴责和唾弃。

中国共产党在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和平合法斗争的时候，并没有对反动派抱任何幻想。还在双十会谈时，毛泽东就指出绝对不要期望反动派发善心，必须时刻准备粉碎蒋介石的军事进攻。1945年9月19日，中共中央在刘少奇主持下，制定了《关于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同时决定华中局北移和山东分局组成华东局，陈毅、饶漱石到山东工作。

确定向北发展，向南防御，是中国共产党关于自卫战争的重大战略决策。在日本投降前夕，党的方针是全面扩大解放区，重点是向南发展。苏军进入东北后，特别是日本投降后，形势发生急剧的变化。蒋介石在美国支持下，迅速抢占了华南和江浙的大城市以及交通要道。这些地区的国民党反动派势力大大超过了革命力量。而且江浙又是蒋介石反动统治的中心，蒋介石无论如何是要力争的。在这种情况下，解放军不仅发展有困难，而且面临着如何保存实力的问题。

中国共产党向北发展，争夺东北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从战略地位看，东北幅员辽阔，有丰富的资源，工业发达，交通便利，对支援整个革命战争极为有利。从地理位置看，它北靠苏联，西接蒙古，东与朝鲜毗邻，南面的辽东半岛与山东半岛隔海相望，西南除有沿海平原与冀东接壤外，更有燕山的居高临下之势，直驱华北平原。从解放区的形势看，陕甘宁边区与晋绥、晋察冀、晋冀鲁豫、山东解放区联成一片，占据华北大部分地区，成为解放区的中心地带。因此如果控制东北，就可以与冀热辽和整个华北解放区联成一片，改变长期被敌人分割包围的状态，使解放军有一个巩固的战略后方。这样，不仅可以保卫华北，而且有利于支援全国解放战争，加速中国革命的

进程。反之，如果东北被敌人控制，就使华北解放区处于南北夹击的不利地位。从敌我力量对比看，东北地区当时没有国民党一兵一卒，国民党也不可能一下子就把它的部队从大西南运到东北，而中国共产党和东北人民有着血肉联系，特别是共产党领导的东北抗日军队，经过长期抗日游击战争，在东北人民中有着深厚的影响，这对中国共产党争夺东北十分有利。

为实现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达到争取东北的目的，中共中央决定建立以彭真为书记的东北中央局，以李富春为书记的冀热辽中央局，还决定派山东分局书记罗荣桓去东北工作。在这同时，中共中央还先后派遣政治局委员陈云、高岗、张闻天和四分之一以上的正式和候补中央委员，率领2万名干部和10万大军（包括山东、华中的主力部队）挺进东北，与原在东北的抗日力量汇合，以消灭日寇和伪满的残余，建立各级地方政府。

但是，蒋介石在美国支持下，从海陆空三路向东北大举进兵。在这种形势下，中共中央于1945年10月，又具体作出了“巩固华北、争取东北、坚持华中”的战略部署。解放军遵照中共中央的战略部署，在华北地区的平绥、同蒲、平汉、津浦各线组织战役，消灭和阻止北进之敌，以保卫华北根据地，掩护人民解放军在东北展开。从11月16日起，国民党军陆续攻占被解放军早已解放的山海关、锦州等地。中共中央分析了东北的形势，于12月28日，发出《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指示，要求人民解放军“让开大路，占领两厢”，在距离国民党占领中心较远的城市和广大农村，放手发动群众，开展土地革命，建立共产党的组织和各种人民团体，发展人民武装，以积蓄力量，准备将来反攻。为了适应东北革命斗争的需要，1945年12月，还组成东北民主联军，林彪任总司令，以统一领导东北人民的斗争。

1946年初，美蒋反动派不断增兵东北，东北内战愈演愈烈。这时，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东北党政军建立了一元化领导，有效地实现了关于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战略部署。

由于东北根据地不断发展和巩固，不仅为解放全东北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而且为全国解放战争的胜利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中国共产党在发展和巩固东北根据地的同时，加紧了粉碎蒋介石军事进攻的准备工作，提出了巩固解放区的各项措施。1945年冬，中共中央发出《一九四六年解放区工作的方针》、《减租和生产是保卫解放区的两件大事》等党内指示。指出：站在自卫立场上，尽一切努力粉碎国民党的进攻，乃是各解放区的中心任务”。强调要抓紧减租、生产和练兵等工作，以巩固解放区，提高人民军队的战斗力。

1946年春，解放区野战军、地方部队和民兵，利用战争间隙，开展了官教兵、兵教官、兵教兵的群众性练兵运动，特别着重于夜战、近战、投弹、刺杀等项技术的练习。加强了部队的政治工作，进一步改善了军政、军民关系，扩充了炮兵和工兵，调整了后勤服务工作。通过练兵运动，大大提高了人民解放军的军事素质，增强了战斗力。对于保卫解放区，粉碎蒋介石军事进攻起了重大作用。重庆谈判使中国共产党的地位与威信大大提高。重庆谈判之后共产党采取的种种措施为粉碎蒋介石的内战作了充分准备，重庆谈判是一个重大历史转折点。从此以后中国进入了解放战争时期。

中国共产党成立

五四运动后一年时间里，全国有 400 多种报刊，在不同程度上介绍了十月革命和宣传了社会主义。与此同时，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经典著作以及介绍马克思主义的名著，也在中国陆续翻译出版。1920 年 4 月，陈望道翻译出版了《共产党宣言》。接着，《国家与革命》、《资本论入门》等著作也公开出版了。所有这些，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人民中间广为传播。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不仅要冲破帝国主义、封建军阀的种种破坏和阻挠，而且还要同形形色色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潮作斗争。西方一些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政治思潮，如改良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实用主义等，也作为“新思潮”涌进中国。所以，从五四运动后，到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思想战线上经历了一场马克思主义同反马克思主义思潮的激烈斗争。李大钊、陈独秀和李达等曾先后同胡适的改良主义、张东荪、梁启超等的伪社会主义以及区声白、黄凌霜等的无政府主义展开了三次论战。通过争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越来越深入人心。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说明建立无产阶级政党的思想条件已经完全具备了。

五四运动后，随着中国工人运动的迅速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广泛传播，在中国建立无产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的任务就提到了议事的日程。

中国共产党的产生不是偶然的。它是中国工人运动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相结合的产物。中国无产阶级的成长壮大是党产生的阶级基础，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是党产生的思想基础。阶级基础与思想基础，二者缺一不可。二者通过五四运动结合起来才产生了中国共产党。历史证明：无产阶级是人类历史上最进步、最革命的阶级。但是，无产阶级的自发斗争是不能产生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只有把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思想灌输到无产阶级中去，才能组织成为真正有战斗力的革命的无产阶级政党。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正是在中国工人运动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相结合的基础上发生和发展起来的，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正是这个结合的伟大成果。

中国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在这一结合中起到了桥梁作用，其中影响最大的是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和周恩来。

酝酿筹建中国共产党，首先是从陈独秀和李大钊开始的。1920 年 2 月，李大钊伴送陈独秀去天津途中，他们交换了关于建党的意见。3 月，李大钊和邓中夏、高君宇等在北京大学秘密发起组织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为建党作了思想上和干部上的准备。3 月，共产国际派威金斯基和俄籍华人杨明斋（翻译）来华，4 月到北京，经北大俄文教授鲍立维的介绍，会见了李大钊。他们多次交谈俄国十月革命和建立中国共产党的问题，认为中国已经具备建立共产党组织的条件。此后，李大钊介绍威金斯基一行赴上海会见陈独秀。

在上海，共产国际的代表和中国的共产主义者交换了对中国革命问题的意见，以及建立中国共产党的问题，并在知识界中介绍了俄国十月革命的情况。在李大钊和陈独秀的倡导下，到了 1920 年末和 1921 年初，上海、北京等地先后建立起共产党的组织。

在上海，威金斯基和陈独秀多次具体地研究了建党问题。共同认为，组织中国共产党，加入共产国际是中国革命的当务之急。1920 年 6 月，开始筹建共产党上海发起组，8 月间正式成立。最初的成员有陈独秀、李汉俊、沈

玄庐、邵力子、施存统、俞秀松、陈公培、陈望道、赵世炎、李达、李秀、袁振英、周振英、周佛海、沈雁冰、杨明斋等人，稍后又有李启汉、刘伯垂等人参加，陈独秀被推为书记。上述的一些人很快就离开了上海，到各地后大都成为各地党组织的发起人。

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在法租界大自鸣钟《新青年》发行部设通讯处。经常在《新青年》社内开会，讨论党的工作和工人运动问题。

1920年8月，上海发起组帮助建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首批团员发展了刘少奇、任弼时、萧劲光等，俞秀松担任团的书记。与此同时，上海发起组还创办了外国语学社，以输送青年出国学习，培养干部。9月，上海小组把《新青年》作为它的机关刊物，11月又出版了《共产党》月刊。这个刊物第一次在中国树起了“共产党”的大旗，阐明中国共产党人的基本观点。此外，上海发起组还创办了工人周刊《劳动界》，开办了劳动补习学校，先后组织了上海机器工会、印刷工会、纺织工会等。

同年11月，上海小组制定了《中国共产党宣言》，这个“宣言”虽没有向外发表，但是在内部起着临时党纲的作用。

1920年冬，陈独秀去广东，其职务由李汉俊代理，次年2月，又由李达代理书记职务。12月，威金斯基离上海去广州。

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是全国建党活动的中心，在它的影响和带动下，从1920年秋到1921年上半年，北京、武汉、长沙、济南、广州等地陆续成立了共产主义小组，在日本和法国的中国留学生和侨民中也建立了这样的小组。

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是在1920年10月成立的，起初只有李大钊、张申府、张国焘三人，不久，又发展了刘仁静、罗章龙，并将青年团的骨干邓中夏、高尚德、何孟孟、缪伯英（女）等转为党员。11月底，他们举行会议，推李大钊为书记，张国焘负责组织，罗章龙负责宣传。到1921年7月为止，北京小组又有范鸿劫、朱务善、李骏、张太雷、陈为人等加入，已拥有党员13人。在筹建党组织过程中，李大钊与陈独秀始终保持密切联系，经常交换意见。他们共同确定党的名称叫共产党。

北京小组建立后，于1920年11月，组建了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高尚德为书记。同时，出版了工人通俗读物《劳动音》周刊，注意促进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同年冬，派邓中夏、张太雷等去长辛店筹建补习学校，1921年元旦正式开学。之后，又建立了长辛店工人俱乐部。此外，北京小组还派人去郑州、天津、唐山、济南等地，指导工人运动，帮助建立革命组织。北京小组在建党活动中也占有重要位置，李大钊成为中共创始人之一，便有“南陈北李，相约建党”之说。

1921年1月，威金斯基从广州到达北京，再次会见李大钊，并和北京小组的成员进行了座谈。他在回国前表示，希望各地共产主义小组能够迅速联合起来，举行全国共产党代表大会，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

湖北共产主义小组是在上海小组帮助下建立起来的。上海发起组成立后，曾先后委托李汉俊和刘伯垂到武汉筹建共产党组织。在刘伯垂、董必武、陈潭秋、包惠僧等人活动下，1920年秋，由刘伯垂召集，在武昌召开会议，成立武汉共产党支部，推选包惠僧为书记，张国恩负责管理财务。以刘芬（即刘伯垂）的律师事务所作为党的机关。当年冬，共产国际代表马耶夫到武汉了解湖北党的工作，包惠僧向他介绍了情况。1921年春，包惠僧离开武汉

去上海，党的工作由陈潭秋负责。在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前，武汉小组的成员有董必武、陈潭秋、刘伯垂、包惠僧、郑凯卿、赵子健、赵子俊、刘子通、黄负生等。

湖北小组成立后，不久，建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刘昌祥、何恐等担任过团的领导人；组织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陈潭秋、恽代英、林育南、黄负生、刘子通、施洋等都是研究会的成员；以武汉中学为活动中心，加强学生工作。为了开展工人运动，他们对工人状况做了初步调查，广泛举办了工人识字班，成立了人力车夫工会。1921年3月，领导了汉口租界人力车工人反对资本家增加车租的罢工斗争。

长沙的建党工作，是在1920年下半年，以毛泽东、何叔衡为中心，在新民学会、文化书社、俄罗斯研究会等进步团体的活动中开展起来的。早在1918年4月，毛泽东和蔡和森、何叔衡等在长沙组织了革命团体新民学会。同年8月，毛泽东第一次到北京，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1919年12月18日，毛泽东为驱逐张敬尧第二次来到北京，进一步研读了一些马克思主义著作。1920年4月，他从北京到上海，与正在筹建共产党的陈独秀多次交谈。这次北京、上海之行，使毛泽东的思想产生质的飞跃，由民主主义者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同年7月，他与何叔衡等着手创办了文化书社，以扩大对马克思主义和新思潮的传播。与此同时，还组织了俄罗斯研究会，发起留俄勤工俭学运动。9月，建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他们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著作，深入到长沙工厂中去，开办工人夜校。1920年10至12月间，正式成立了湖南的共产主义小组，成员有毛泽东、何叔衡等10人。

在从事建党活动的同时，他们还开展了建党思想的讨论。这种讨论集中反映在新民学会留法勤工俭学会员与国内会员的讨论中，特别是毛泽东和蔡和森的通讯中，明确提出改造中国与世界必须成立主义明确、方法得当的党。长沙建党工作的重要特点，是从当地社会政治状况的实际出发，做了大量扎实的工作，保证了建党工作的健康发展。

山东共产主义小组是在北京、上海小组的帮助下建立起来的。1920年4月，共产国际代表威金斯基等由北京去上海途经济南时，与王尽美、邓恩铭等商谈了关于传播马克思主义和建立共产党组织的问题。同年夏天，上海小组建立后，陈独秀通知王尽美、邓恩铭等人着手组建济南共产党组织。之后，王、邓成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和励新学会。在此期间，王尽美时常去北京，向李大钊等请教如何在山东开展革命运动和建立党组织等问题。11月，李大钊派陈为人到济南帮助建党，于是王尽美、邓恩铭等秘密建立了山东共产主义小组，其成立时间约在1920年底或1921年春。这个小组成立后，组织了劳动周刊社，出版了《济南劳动周刊》，他们还到工人中活动，在济南津浦机车厂建立了工人俱乐部。

广东共产主义小组的建立，走过一段曲折之路。1920年秋，两位俄国人在广州建立俄国通讯社时，经无政府主义者黄凌霜介绍，在广州与7个无政府主义者建立了广东党的小组，实际上是无政府主义的组织。1920年冬，陈独秀应陈炯明的邀请，到广东就任教育政务委员会委员长。陈独秀到广州后，与无政府主义者展开激烈的讨论，无政府主义者因不愿接受在党纲中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的观点而退出组织。与此同时，陈独秀找到谭平山、谭植棠、陈公博等人，经过酝酿，约在1921年3月间，他们重新组建了广州共产主义小组，谭平山任书记、谭植棠管组织、陈公博管宣传。小组成立后，建立了“马

克思主义研究会”，继续办好《劳动者》，创办《劳动与妇女》。在工人运动方面，他们先后成立了理发工会、土木建筑工会等 30 多个。

1921 年 1 月，陈独秀把《新青年》杂志社由上海迁到广州。这对广东的马克思主义宣传是一个很大的推进。《新青年》开展的对无政府主义的批判，有力地清除了无政府主义在广东的影响。

中国国外共产主义小组主要是在日本和法国。在日本，主要有施存统和周佛海，他们是在上海加入共产主义小组，然后去日本的，施存统是小组负责人。在法国，陈独秀委托张申府在法国勤工俭学学生中建立小组。1920 年 12 月，张申府到法国。1921 年初，张申府介绍刘清扬入党，随后，又与刘清扬一起介绍周恩来入党。二三月间。在法国的赵世炎、陈公培也先后与张申府接上了关系，组成旅法共产主义小组，负责人是张申府。小组曾出版机关刊物《少年》。当时，这个小组处于秘密状态，在留法勤工俭学学生和华工中没有以小组名义出面开展活动。1921 年 7 月，国内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时，在法国的共产主义小组因没有接到开会通知故未参加。

当时，这些早期共产主义组织的名称并不一致，有的叫“共产党”，有的叫“共产党支部”，有的叫“共产党小组”，但都是共产主义小组性质的组织。在各地共产主义小组成立前后，还建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

各地共产主义小组建立后，一面继续在知识分子中间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另一方面创办刊物，到工人群众中去，进行宣传教育。这些通俗刊物，在上海有《劳动界》、《伙友》，在北京有《劳动音》，在广州有《劳动者》。在法国也创办了《少年》。通过这些刊物，以通俗的语言，生动的事实，向工人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使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结合起来。

马克思列宁主义同工人运动相结合，是在斗争中实现的。各地共产主义小组曾不断揭露压迫者的破坏，排除旧势力的影响，破除“天命论”，消除行会和无政府主义的思想，并采取各种形式，向工人灌输革命道理，启发他们的觉悟，领导和组织他们进行斗争。如上海共产党组织在沪西小沙渡地区创办了劳动补习学校，在工人群众中进行宣传和组织工作；北京共产主义小组在长辛店开办劳动补习学校，由邓中夏负责，通过学习提高了工人的思想觉悟，推动了北方各地的职工运动；在武汉通过“识字班”，向工人进行宣传教育，组织和领导他们进行斗争；在湖南毛泽东到纺纱厂、火车头修理厂，举办工人学校，向他们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并通过长期耐心的教育，清除无政府主义思潮在工人中的影响，使无政府主义者黄爱、庞人铨转变为共产主义者。通过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的活动，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就日益结合起来了。

在各地共产主义小组建立的过程中，许多共产主义者，为了把党建立在牢固的基础上，他们非常重视马列主义理论的指导作用。李大钊、毛泽东、李达、蔡和森和陈独秀等，在其文章和通信中，宣传和讨论了唯物史观、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基础观点，在思想理论上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奠定了基础。当时的共产主义者，由于受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得到共产国际的帮助，避免了西欧无产阶级政党那种社会民主主义传统的影响，所以一开始就是以列宁的建党思想作为指导，以布尔什维克党作为自己建党的榜样。

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的建立，标志着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大大前进了一步。由于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的积极工作，因此建立统一的全

国性的共产党的准备工作已逐步完成。

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的建立及其活动，表明成立全国统一的共产党的条件已经成熟。1921年6月3日，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马林到达上海。他与尼可尔斯基一道和李达、李汉俊建立了工作联系，提出召开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的建议。李达分别与在广州的陈独秀、北京的李大钊联系商议，确定在上海召开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于是，李达、李汉俊分别写信给北京、长沙、武汉、广州、济南以及日本留学生中的组织或党员，通知他们各派两名代表来上海，出席党的全国代表大会。1921年7月23日晚8时，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法租界贝勒路树德里3号（解放前曾改为望志路106号，现为兴业路76号）开幕。出席会议的有毛泽东、何叔衡、董必武、陈潭秋、王尽美、邓恩铭、李达、李汉俊、张国焘、刘仁静、陈公博、周佛海，还有陈独秀指派的代表包惠僧共13人。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尼可尔斯基也出席了会议。会议原定由陈独秀主持，但他因广州公务繁忙不能抽身，未能出席会议。临开会前才另定了主持人，因会议主持者必须经常与各地代表以及共产国际代表联系，而李达、李汉俊都不喜交往，遂推张国焘主持会议，毛泽东与周佛海任记录。

张国焘向大会报告了会议的筹备经过，说明了这次代表大会的重要意义，并提出这次代表大会应当具体讨论和解决的各种问题，首先是制定党的纲领和实际工作计划。马林、尼可尔斯基在会议上热情致词，由李汉俊、刘仁静即席翻译。代表们商讨了这次会议的议程和任务。

马林在会上指出：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具有重大的世界意义。共产国际增添了一个东方支部，苏俄布尔什维克增添了一个东方战友。他希望中国同志努力工作，接受共产国际的指导，为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作出自己的贡献。接着，马林分析了国际形势，介绍了共产国际的工作状况，以及他在爪哇建党活动的情况和经验。他还提出中国党目前工人成分太少，建议党要特别注意开展工人运动，建立工会组织，把工人中的积极分子吸收到党内来。尼可尔斯基在会议上介绍了赤色职工国际和共产国际远东局的情况。

7月24日各地代表向大会报告工作，由于各地组织成立的时间不长，工作只是初步展开，因此，代表们的报告大多比较简短。

7月25日26日休会两天，用于起草会议文件。由董必武、李达、张国焘等组成起草委员会，起草了党的纲领。

7月27、28、29三天，大会举行三次会议，集中讨论了起草小组提出的会议文件草案。各地代表在党的性质、纲领和组织原则等主要问题上取得了基本一致的意见。但在党员能否当议员或者到现政府中做官等问题上，引起了激烈争论。

30晚，举行第六次会议。但这次会议刚开始就受到了法租界巡捕的侵扰，致使会议未能正常进行。当夜12时左右，多数代表聚会，商定次日大会改在浙江嘉兴南湖召开。

7月31日上午，会议在嘉兴南湖的一艘游船上继续开会（陈公博未出席这次会议），通过了党的纲领和决议，选举产生了党的中央领导机构，选举陈独秀为中央局书记，李达为宣传主任，张国焘为组织主任。下午六时，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胜利闭幕。

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讨论通过的党的第一个纲领，是一个历史性的文献，它申明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规定了奋斗目标、组织原

则以及共产党与其它政党的关系。党纲具体规定：“我们的党定名为‘中国共产党’。奋斗目标是：以无产阶级的革命军队推翻资产阶级，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废除私有制，最终目标是达到消灭阶级差别的共产主义。共产党人从开始就立志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党纲规定，凡承认党的纲领和政策，愿意忠于党的人，经党员介绍，都可以接收为党员，但是在入党前“必须与那些与我们纲领背道而驰的党派和集团断绝一切联系”。纲领还规定了党的组织原则和组织机构以及严格的纪律。党纲中原则规定：“除为现行法律所迫或征得党的同意外，任何党员不得担任政府官员或国会议员，但士兵、警察、文职雇员不受此限。”

大会还通过了关于当前实际工作的决议。确定了党成立后的中心任务是组织工人阶级，建立工会，开办工人学校，提高工人的觉悟，开展工人运动。在对待其它党派的态度上，要求党在政治斗争中，永远站在独立的立场上，采取独立的政策以维护无产阶级的利益。

大会在讨论党的基本任务和原则时，有人主张直接搞社会主义革命，以实现无产阶级专政为直接奋斗目标，反对参加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任何合法斗争，党拒绝了这种观点，决定按列宁的建党原则办事。

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是中国历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件，它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在中国出现了完全新式的、以共产主义为目的、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行动指南的、统一的无产阶级的政党。它肩负着为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坚决奋斗的责任，在群众中享有崇高的威望，深受全民族的信赖，成为领导他们进行斗争的核心力量。因此，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的面貌就焕然一新了。

中国共产党一成立，就领导工人阶级向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展开斗争。从1922年到1923年，各地工人运动此起彼伏，声势浩大。

香港的中国海员首先掀起了大规模的罢工斗争，直接打击了英国殖民主义统治。香港自从沦为英国殖民地以后，中国劳动人民和外国统治者就存在着深刻的矛盾。同是海员，中国海员待遇低，工资微薄，还不断受到歧视，而白人海员却高人一等。中国工人早就对此不满，1922年1月，海员们决定举行罢工，要求增加工资，反对资本家的剥削压迫。

海员罢工后轮船停运，物资来源中断，粮食没有了，香港英国政府立刻慌了手脚。他们派兵强行封闭了海员工会，还打死了六名工人，想逼工人复工。

这一来，把大陆的海员也激怒了。他们纷纷起来支持香港海员，进一步对香港实行封锁，不让一粒米进入这块殖民地。在香港的中国海员也陆续回广州，港英当局没了办法，只好接受工会提出的条件，还取消了封闭工会的禁令。

海员的斗争胜利了。这不但使香港海员兴高采烈，也使全国工人看到了自己的力量，受到鼓舞。这年5月1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第一次全国劳工大会在广州举行，筹划成立全国总工会。从此，工人们为求生存，争权益而掀起了斗争的高潮。

长辛店铁路工人、粤汉铁路工人、安源路矿工人、山海关铁路工人、开滦煤矿工人相继罢工。其中，毛泽东、刘少奇、李立三等领导的安源工人罢工，无论在勇气上还是策略上都有很高水平，标志着工人运动进一步成熟。

在全国工人运动的高潮中，京汉铁路（从北京到汉口）工人十分活跃。

1923年1月底。全线各站派出代表在郑州开会，准备成立总工会。控制这个地区的直系军阀吴佩孚听说后，立刻下令禁止。

2月1日这一天，300多名工人代表，手拿红旗，喜气洋洋地朝郑州市中心的普乐戏园走来，总工会成立大会要在这里召开。突然，一阵警笛响起，一队持枪军警由市警察局长率领着，包围了戏园，把住了各个路口，不准工人代表通过。工人代表不管这一套，冲破警察的封锁，进入了会场。大会照常举行，京汉铁路总工会宣告成立。

吴佩孚接到报告，恼羞成怒，立刻派出大批军警冲进戏园，捣毁了会场和工会办事处。2月7日这一天，京汉铁路的其他各站：长辛店、郑州、信阳、广水、驻马店等地工人都遭到了吴佩孚军阀的血腥镇压。“二七惨案”震动了全国和世界。国内各地工人纷纷集会，抗议军阀的暴行；国际工人组织也发表声明，支持京汉铁路工人的斗争。工人阶级以自己的实际行动，证明他们不愧是最有斗争性的队伍。

血的教训也使中国共产党人认识到，在强大的敌人面前，只靠赤手空拳的工人是不能取得革命胜利的。革命者必须和全国人民联合起来，和其他革命政党联合起来，结成统一战线。

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22年7月16日至23日在上海召开。大会的中心议题是制定党的民主革命纲领。大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的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中国共产党的最高纲领，规定了党的最终目标和主要任务，这就是渐次达到一个共产主义的社会。中国共产党的最低纲领，规定了党在当前的奋斗目标和最近的任务是“消除内乱，打倒军阀，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统一中国为“真正民主共和国”。党的二大是一大的继续与扩大。从此，党的事业迅速发展。

毛泽东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

八一南昌起义是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诞生的日子。它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地领导革命战争和创立革命军队的开始。南昌起义打响了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在全党和全国人民面前树立了一面鲜明的武装斗争的旗帜。南昌起义所点燃的武装斗争的星星之火，经过伟大的井冈山会师，沿着井冈山的道路终于形成了埋葬国民党反动派的燎原之火。

1927年8月7日，为了总结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经验教训，纠正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路线，确定以后革命斗争的方向，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了紧急会议，毛泽东、蔡和森、张太雷、任弼时、苏兆征、邓中夏、邓小平、李维汉等出席了这次会议。会议由瞿秋白主持。参加会议的有中央委员12人，候补中央委员3人，团中央委员5人，地方代表2人。毛泽东在会上批判了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者自动放弃统一战线领导权以及反对农民革命的错误，他指出，民众运动没有枪杆子是不行的，须知政权是从枪杆子里面出来的。“八七”会议在中国革命的危急关头坚决地纠正和结束了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并撤换了陈独秀的领导职务。会议通过了《中共“八七”会议告全党党员书》、《最近农民斗争决议案》、《最近职工运动决议案》及《党的组织问题决议案》，并选举了党的临时中央政治局。毛泽东被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会议确立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屠杀政策的总方针，号召全党和全国人民继续进行革命的战斗，决定在湖南、湖北、江西、广东这四个革命基础较好的省份，发动农民，举行秋收起义。

“八七”会议在党的历史上是有功绩的。它反对了政治上的右倾机会主义，使党大进了一步。

第一，会议坚决批判和纠正了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会议指出，“党的指导机关执行了很深的机会主义的错误方针”，“不仅完全放弃了共产党的独立性”，并且取消了“革命群众运动之存在”，这在客观上是对革命的变节。在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指导下，“不是共产党指导国民党，而是国民党的上层分子完全在政治上俘虏了共产党的指导者”，因而导致了大革命的失败。结果不纠正过去的错误，就不能规定将来的工作，更不能进行革命斗争。

第二，确定了实行土地革命的方针。

第三，确定了以武装起义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总方针。会议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及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应当在极短期间调最最积极的、坚强的、革命性稳定的、有斗争经验的同志，尽量分配到各主要省份做农民暴动的组织者。并且决定在湘、鄂、赣、粤四省革命基础比较好的地方发动秋收起义，“夺取乡村政权”，组织革命委员会，向反革命势力进攻。

第四，撤销了陈独秀总书记的职务，成立了新的临时中央政治局。会议推选瞿秋白为中共中央总书记，苏兆征、罗亦农、彭湃、任弼时、李维汉等九人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毛泽东、周恩来、彭公达等七人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八七”会议在革命的危急关头，制定了党的新的策略路线，扭转了党内的混乱状况，整顿了党和革命的队伍，对领导人民坚持斗争起了很大作用。但是，“八七”会议也有缺点和错误。它在反对右倾错误的同时，却为“左”倾错误开辟了道路，对大革命失败后革命力量遭到严重摧残和革命处于低

潮，缺乏正确估计；没有认识到应当根据各地不同的情况，来组织正确的反攻或必要策略上的退却，借以有计划地保存革命阵地和收集革命力量，反而容许和助长了冒险主义和命令主义（特别是强迫工人罢工）的倾向。同时，它在组织上开始了宗派主义的过火的党内斗争，过分地或不适当地强调了领导干部的单纯的工人成分的意义，并造成了党内相当严重的极端民主化状态。

“八七”会议后，在党的领导下，湘、鄂、粤、赣四省相继举行了工农武装的秋收起义，全国各地在几年中举行起义的地方，大小有200余处。毛泽东在“八七”会议后受党中央的委托，以中央特派员的身份，赶赴湖南，组织领导湖南秋收起义。毛泽东到达长沙后，立即向改组后的湖南省委传达了“八七”会议精神，同省委一起详细讨论研究了有关起义的一系列重大问题，确定了湖南秋收起义的具体计划，成立了秋收起义的最高领导机关——前敌委员会，毛泽东任书记。毛泽东在会上指出：秋收起义的目的，是要彻底实行土地革命，建立工农民主政权；为此，党应当用主要力量来领导武装斗争，用枪杆子推动土地革命。根据毛泽东的建议，又决定集中力量发动湘东、赣西各县的起义。

湖南省委会议后，毛泽东和毛泽民、潘心源从长沙到安源。8月下旬，毛泽东在安源张家湾召开军事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暴动地区党的负责人和军事负责人王新亚、蔡以忱等，具体部署了起义计划。决定将中国共产党掌握的湘东、赣西一带武装力量统一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总指挥卢德铭，师长余洒渡，副师长余贲民，下辖三个团。第一团团团长钟文璋，以武汉国民政府警卫团为骨干，和平江农民义勇队、湖北崇阳农民自卫军组成，驻江西修水；第二团团团长王新亚，党代表张明山，以安源矿警队为骨干，和安源工人纠察队，萍乡、醴陵、安福、莲花农民自卫军组成，驻安源；第三团团团长苏先骏，党代表潘心源，以浏阳工农义勇队和原武昌国民政府警卫团一部组成，驻铜鼓。三个团合计兵力约5000人。当时，还有第四团，团长邱国轩，由原夏斗寅残部组成，在起义中叛变。安源军事会议还决定了起义进军的路线。起义部队的行动计划和进军路线是：一团由修水出发进攻平江，发动平江农民暴动，夺取平江后再向长沙发展。二团自安源进攻萍乡、醴陵，与醴陵、株洲的农民暴动相结合，对长沙取包围形势。三团自铜鼓出发，向浏阳进攻，发动浏阳农民四乡暴动。各路得手后，以长沙工人暴动为内应，相机攻克长沙。

1927年9月9日，震动全国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爆发了。

起义是完全按照预定的计划进行的，中共湖南省委发动长沙工人赤卫队和近郊农民首先起来，破坏了岳阳至株洲的铁路交通。与此同时，工农革命军四个团，分别从江西修水、安源、铜鼓出发，向长沙进击，并先后占领了醴陵、浏阳县城和平江的龙门厂、浏阳的白沙、东门市等地。

起义军分三路。第一路即第二团，9月9日在安源起义，12日攻克醴陵，15日顺利地占领了浏阳城。但因主要领导人王新亚骄傲轻敌，未及时撤出浏阳城，结果敌人从长沙、株洲增援，起义部队陷入重围严重失利，在突围中损失三分之二。第二路即第一团，9月9日从修水向长寿街、平江进发，胜利地占领了平江龙门厂。这时收编在起义部队中的土匪邱国轩部叛变，向起义军袭击，使一团腹背受敌，牺牲一百多人，战斗失利，遂向浏阳方向转移。第三路即第三团，9月11日在毛泽东亲自指挥下，向浏阳白沙镇进发，首战

告捷，12日又占领东门市，连战皆捷。14日唐生智所部两个团分两路夹攻，起义军受到部分损失，遂分三路向浏阳上坪方向转移。

各路起义部队遭到挫折后，一部分失散了，一部分不坚定分子离开了部队。毛泽东当机立断，决定各路起义部队到浏阳文家市集中。9月19日，毛泽东在文家市里仁小学主持召开前敌委员会会议，讨论部队的进军方向问题。毛泽东分析了敌强我弱的形势，认为占领中心城市已不可能。主张改变攻打长沙的计划，把革命工作的重点转向敌人统治势力薄弱的农村去，而余洒渡等却否认敌强我弱的形势，顽固坚持“取浏阳直攻长沙”的意见。会议经过讨论，大多数支持毛泽东的意见，决定起义部队向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农村进军。

9月20日，毛泽东率领工农革命军向湘赣边界的井冈山进军。

这是一个伟大的战略决策，部队从此踏上了毛泽东指出的开辟农村根据地的正确道路。南进途中，在江西芦溪又受到敌人伏击。部队一共剩下了不到1000人。

9月29日，工农革命军到达永新县境的三湾村。毛泽东在这里进行了著名的三湾改编。改编的主要内容是：整顿队伍，将原来的三个团缩编为一个团，称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人员虽然减少到不足1000人，但队伍精干了。建立了军队的政治工作和党代表制度，“支部建在连上”，班排设小组，连设支部、连以上设党代表，营、团建立党委。整个部队由前敌委员会统一领导。同时，军队内部实行民主制度，建立士兵委员会，实行政治民主，经济公开，取消旧军队的雇佣制。三湾改编，从政治上、组织上奠定了新型的人民军队的基础。10月3日，工农革命军到达宁冈古城，毛泽东召集了古城会议，总结了湘赣秋收起义的经验教训，着重讨论了在井冈山区域建立革命根据地问题。毛泽东指出，为创建井冈山根据地，党和军队要执行开展武装斗争，深入土地革命和建设根据地三项任务，并把三者紧密结合起来。毛泽东还提出团结当地农民武装力量，共同建设根据地的方针。10月27日，毛泽东率领部队到达井冈山的中心茨坪。以天险的茨坪、大小五井、茅坪等村庄为根据地的指挥中心和后方。从文家市到茨坪，历时一个多月，辗转作战，终于将红旗插上了井冈山，开创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新局面。

毛泽东选择井冈山作为革命根据地是因为：首先，井冈山位在罗霄山脉的中段，而罗霄山脉南接广东，北衔湖北，东西分界江西、湖南，一切革命的举动都足以影响湘、鄂、赣三省的工农群众。第二，这里党的组织和群众基础较好，并有丰富斗争经验的地方武装。第三，井冈山上村落，出产稻米和各种杂粮，四围连接着物产较为丰富的地区，便于红军筹款、筹粮。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井冈山位于江西的遂川、宁冈、永新、莲花和湖南的茶陵、酃县等县之间，以宁冈为中心，周围500里、纵横80里，峭壁耸立，森林蔽天，只有五条坎坷崎岖小道，通向山里，形势险要，居高临下，易守难攻。因此，井冈山是很好的军事后方根据地，最有利于红军的军事割据。

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是经过十分艰苦的斗争逐步发展起来的。红军到达边界时，党的组织已全部被敌人破坏了，只剩下若干避难藏匿的党员，群众革命组织也受到敌人的摧残，农民自卫军的枪支绝大部分被豪绅缴去，群众革命情绪受到严重挫伤。在这种非常困难的条件下，毛泽东首先恢复和建立边界各级地方党组织，军队的党帮助地方党的发展，作为开展工作的领导力

量。

工农革命军到达井冈山地区后，毛泽东领导井冈山军民，发动游击战争，进行土地革命，建立工农政权，发展地方武装，恢复和建立地方与军队中党的组织，坚持了长期的斗争。1927年11月中旬，趁湘桂军阀混战、边界各县守敌空虚的有利时机，毛泽东派宛希先率部攻占领了茶陵县城，11月下旬建立了湘赣边界第一个工农民主政权——茶陵县工农兵政府，谭震林为工农兵政府主席。1928年1月初，毛泽东率领工农革命军在大坑打败了肖家壁的靖卫团，乘胜占领遂川县城，于1月下旬建立了遂川县工农兵政府，王次淳为工农兵政府主席。2月中旬，毛泽东又率部攻打宁冈新城，活捉国民党宁冈县县长张开阳，俘敌400余人，缴枪400余支，并于2月下旬成立了宁冈县工农兵政府，文根宗为工农兵政府主席。工农革命军打到那里，就在那里帮助群众建立政权以至共产党的组织。到1928年2月，先后建立了茶陵县委、遂川县委、宁冈县委、永新县委，以及酃县特别区委、莲花特别支部。前委和万安县委也发生了联系。同时，还在永新、遂川、宁冈、茶陵建立赤卫大队，区、乡建立了赤卫队、暴动队。3月中旬，酃县也建立了赤卫队。并对袁文才、王佐的地方武装进行改造。把袁、王部队改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二团，袁文才任团长，王佐任副团长，徐彦刚任参谋长，何长工任党代表。工农革命扩大到1500余人。这样，经过半年的艰苦工作，以宁冈为中心的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初步地建立起来了。

毛泽东还领导红军，开展游击战争，充分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进行土地革命，建立工农政权。到1928年6月，革命根据地大部分地区的地主土地分配给农民了，小部分地区在分配中，乡区政权普遍建立，并成立了湘赣边界工农民主政府。同时，乡村普遍组织了暴动队，区、县则成立了赤卫队。由于敌人严密封锁，根据地食盐、布匹、药材等日用必需品十分缺乏，红军物质生活非常艰苦，红军官兵一律每人每天五分钱的油盐柴菜钱，经常吃的是粗糙的红米饭和没有油盐的南瓜汤，有时甚至要靠野菜充饥，冬天棉衣、棉被不够，盖着稻草睡觉。在毛泽东的教育和带领下，边界军民发扬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精神，因陋就简地办起了红军医院，自己上山采药，村村办起熬硝盐厂，自己动手熬硝盐，自己种棉花，纺纱织布，实行正确的工商业政策，开办红色圩场，繁荣根据地的经济。这样，根据地的红军和人民，依靠自己的力量，采用种种办法打破了敌人的反革命经济封锁，渡过了艰难的岁月，赢得了创建红色政权的胜利。

在毛泽东的正确领导下，一支完全新型的服务于人民革命斗争和根据地建设的人民军队成长发展起来。红军中坚持实行党代表制度和“支部建立在连上”的原则；发展大批工农战士入党；坚持实行民主制度；加强部队的阶级教育和文化知识教育。毛泽东在井冈山斗争初期，正式宣布了红军的三项纪律（行动听指挥、不拿工人农民一点东西、打土豪要归公），后来又提出六项注意（上门板、捆铺草、说话和气、买卖公平、借东西要还、损坏东西要赔），以后逐步发展为“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这些纪律，对于正确处理军队内部关系和团结人民起了伟大的作用，使军队紧紧地依靠人民群众，永远立于不败之地。1927年底，毛泽东规定了红军的三大任务：第一，打仗消灭敌人；第二，打土豪筹款子；第三，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设革命政权。这样，就使红军从根本宗旨上区别于任何旧式的军队。由于群众武装、地方武装组织的不断扩大，从而创立了正规红军、地方赤卫

队和工农暴动队三结合的武装力量体制，开展了真正的人民游击战争。在1928年4月朱德率部和毛泽东会师后，适应当时的情况，又产生了游击战争的十六字诀：“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这样，就初步形成了人民军队建设的基本原则和人民游击战争的基本战略战术，为日益发展的工农武装割据的局面，创造了必要的条件。

1928年4月底，朱德、陈毅率领南昌起义保存下来的部队和湘南起义农军共8000余人，在宁冈砦市与毛泽东领导的工农革命军胜利会师。

自从潮汕失败以后，朱德、陈毅率领的起义军，一无供给，二无援兵，受着寒冷、饥饿和流行病的折磨，失望和混乱的情绪笼罩着部队。在这极端艰难的时刻，朱德、陈毅坚决领导这支革命队伍，一面和敌人战斗，一面和部队内部的失败情绪作斗争。1927年10月下旬，在信丰城西的一个小山坳里，朱德召开了全体军人大会，他以俄国革命胜利所走的曲折革命道路作比喻，坚定地指出：我们只要留得一点人，在将来的革命中间就会起很大的作用。”他还卓有预见地指出：“蒋桂战争一定要爆发的，蒋冯战争也一定要爆发的。军阀不争地盘是不可能的，要争地盘就要打仗、现在新军阀也不可能不打。他们打，那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发展了。”陈毅也鼓励大家要经得起失败的考验，要做失败时的英雄。这次大会，极大地加强了部队的革命信心。接着，部队进行了整编，朱德任司令，陈毅任指导员。1927年11月上旬，朱德、陈毅抓住了军阀混战的有利时机，率部在湘、鄂、赣三省交界的崇义县西南山区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接着，又利用朱德与驻韶关的地方军阀范石生的老同学关系，率部进驻韶关附近休整，得到范石生的枪枝弹药和衣被的补充。同时，与湘南、粤北的党组织取得了紧密联系，并派毛泽覃到井冈山，同毛泽东所部取得联系。1928年1月，朱德、陈毅根据党中央和湖南省委的指示，率部开赴湘南，领导湘南起义。在湘南特委的协助下，1月22日，部队开进宜章县城，在全城一片欢腾声中，在县政府门前升起了革命的红旗。部队也正式打出了“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的红旗。同时，参加起义的一部分农民建立了宜章农军，革命风暴迅速席卷了全县。蒋介石急忙派“马日事变”的刽子手许克祥带五个团从广东韶关直奔宜章，妄图扑灭刚燃起的革命烈火。朱德、陈毅将部队撤至城南40公里的山地，在农军的协助下，将敌击溃，歼灭其一部。工农革命军乘胜追击，在坪石将敌五个团全部打垮，许克祥化装潜逃。起义军重新占领了宜章县城，立即着手建立革命政权，成立各种群众组织，提出了“打土豪，分田地”的口号，开始了打土豪的斗争，群众起来烧毁田契，有的地方自发地分了土地。宜章起义的胜利，揭开了湘南起义的序幕。

朱德、陈毅率领的工农革命军仅用了一个月时间，就把革命红旗插遍了湘南的宜章、郴州、永兴、资兴、耒阳五县。在这五县胜利影响下，起义的烈火，又迅速地在桂阳、安仁、常宁、桂东、汝县、衡阳等县的大部分地区，以及茶陵、攸县、酃县、临武、嘉禾等县的部分地区燃烧起来。革命势力的发展，威震华南。粤、桂、湘军阀以七个师的兵力，分南北西三路，对起义军进行“协剿”。朱德、陈毅为了保存军力，避免在不利条件下同敌人决战，果断地决定起义军撤出湘南，向井冈山地区转移。毛泽东亲率井冈山工农革命军两个团，分两路迎接并掩护湘南部队转移。朱德、陈毅率领的湘南部队顺利到达砦市。毛泽东率领的部队完成掩护任务后，也胜利地回到砦市。5月4日，召开了庆祝胜利会师大会，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朱德任军

长，毛泽东任党代表，陈毅任政治部主任，下辖三个师，人数约一万余。又成立了党的前敌委员会，作为边界党和军队及政权的最高领导机关，由毛泽东任前委书记。

会师后，在毛泽东领导下，取得了各次军事胜利和群众割据的发展，尤其是6月23日龙源口大捷，歼敌一个团，打垮两个团，缴枪千余枝，取得了井冈山根据地创建以来的最大一次胜利。井冈山根据地扩大到宁冈、永新、莲花三个全县，吉安、安福各一小部，遂川北部，酃县东南部，达到边界全盛时期。

毛泽东率领起义部队向井冈山区域的进军，以及同朱德、陈毅率领的八一起义和湘南起义保存下来的部队会师，创造和扩大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具有极其伟大的历史意义。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是把革命的退却和革命的进攻结合起来的最好的典范。这个进军是在革命暂时失败的形势下，革命力量被迫从城市退却下来，正确地转移到敌人统治力量较薄弱、革命基础深厚的农村，特别是数省边界的边区，地势险要的山区，形成工农武装割据，创立了边界农村革命根据地，点燃了创造红色政权的星星之火，为中国革命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崭新道路。它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上的伟大创举。毛泽东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具体革命实践相结合，领导了湘赣秋收起义和井冈山的斗争，同时总结了其他各地革命斗争的经验，创造性地开辟了这条中国革命唯一正确的道路。

井冈山根据地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依靠枪杆子发展起来的。1928年4月到7月，正值南方反动统治势力暂时稳定的时期，湘赣两省敌人向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发动了多次“会剿”，敌军少则八九个团，多则达十八个团，超过红军数倍。然而红军以不足四个团的兵力，粉碎了敌人的多次“进剿”。5月上旬，敌人进攻遂川的五斗江，红军采用声东击西、避实就虚的战术，从侧面打击敌人，在遂川的黄坳、五斗江等地，歼灭了来犯之赣敌，第一次攻占了永新城。5月下旬，敌人又从吉安向永新推进，红军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声东击西，远道奔袭，歼敌一个团，捣毁敌指挥部，第二次占领永新。6月下旬，湘赣两省敌军10个团联合“会剿”井冈山根据地。毛泽东、朱德、陈毅亲临前线指挥，红军在龙源口、七溪岭一带，从腹背两面猛击敌军，打败了号称江西劲旅的杨池生、杨如轩两个师，取得了井冈山根据地创建以来最大的一次胜利。毛泽东及时地总结了红军游击战争的经验，肯定了“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十六字诀的作战原则。红军取得反“会剿”战争胜利后，又分兵发动群众，割据地区采取波浪式推进政策，二十八团去安福边境，二十九团去莲花，三十一团去吉安边界，逐渐地扩大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这时，根据地的固定区域，扩大到包括宁冈、永新、莲花三个全县，吉安、安福各一小部，遂川北部，酃县东南部。边界各县区、乡政权普遍建立。5月下旬成立湘赣边界最高的领导机关——湘赣边界工农民主政府。这是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全盛时期。

红军战争的胜利，又推动了土地革命的开展。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土地革命，是从1927年秋天开始的。但在根据地初创时期，主要是打土豪、分浮财、废债毁约，取消各种苛捐杂税。分配土地只是在少数地区试行。1928年5月20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的湘赣边界第一次代表大会，着重讨论了深入开展土地革命的问题。这次大会成立了中国共产党湘赣边界特委，毛泽东为书记。大会后，湘赣边界各县、区、乡普遍设立了土地革命委员会，

从组织上加强了对土地革命的领导，开展了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

对中、小工商业者采取保护的政策；只没收其封建剥削部分，而工商业部分不动。对地主阶级采取消灭的政策。但对地主分子给予生活出路，按人口分给一分土地，对全家外逃的大土豪劣绅，则不予分田。分田的同时，还展开了废债运动。

土地革命的开展，解放了农村生产力，激发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农民在自己的土地上精耕细作，改良土壤，养猪积肥，兴修水利，使农业生产获得了丰收。1928年秋天，井冈山根据地农业生产普遍获得大丰收，宁冈全县粮食总产比1927年增产百分之二十，茶油丰收更是十几年来所没有的。永新、莲花、遂川等地出现了空前的好收成。工农民主政府又领导根据地人民大力发展生产，保护资本主义工商业，开辟圩场，建立根据地的财政金融制度，使根据地的经济逐渐繁荣起来，保障了根据地人民生活的需要。此外，文化教育事业也发展起来了。根据地建设的成就，保证了革命战争的胜利进行。

在革命斗争中，建立了一种最能发动群众力量和最利于斗争的工农兵民主政权——工农兵代表会议和工农兵政府。同时，在工农红军的积极帮助下，普遍建立地方武装。这些地方革命武装，对保卫地方革命政权起了巨大的作用。

这个时期，湘赣边界的割据局面一天一天扩大，土地革命一天一天深入，红色政权一天一天推广，红军和赤卫队一天一天扩大，井冈山根据地呈现一片大好形势。当时边界特委（毛泽东为书记）和军委（陈毅为书记）的政策是：坚决地和敌人作斗争，造成罗霄山脉中段政权，反对逃跑主义；深入割据地区的土地革命；军队的党帮助地方党的发展，军队的武装帮助地方武装的发展；对统治势力比较强大的湖南取守势，对统治势力比较薄弱的江西取攻势；用大力经营永新，创造群众的割据，布置长期的斗争；集中红军相机迎击当前之敌，反对分兵，避免被敌人各个击破；割据地区的扩大采取波浪式的推进政策，反对冒进政策。

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形势迅速向前发展的时候，中共湖南省委多次派代表到井冈山，指责湘赣边界党是“极严重的保守观念”，不顾当时正值南方统治势力暂时稳定的时期，命令红军大队远离根据地冒进湘南。毛泽东于6月30日在永新召开边界特委、红四军军委和永新县委联席会议，讨论湖南省委的命令，一致决定，红四军主力不应离开根据地冒进湘南，而应“继续在湘赣边界各县作深入的群众工作，建设巩固的根据地。”可是湖南省委代表趁毛泽东、宛希先远在永新时，不察当时的环境，不顾联席会议的决议，于7月中旬，强令红军大队向湘南冒进去打郴州，结果使边界和红军一齐失败，红军数量上约损失一半；边界被焚之屋，被杀之人不可胜数，各县相继失陷，造成了“八月失败”。毛泽东得知红军大队在湘南失利的消息后，亲自率领一营兵力往湘南迎还大队。8月下旬，两军在桂东会合后，打退了敌人的追击，决定返回井冈山。8月30日，湘赣两省敌军以四个团的兵力，从黄洋界进攻井冈山。红军凭险抵抗，英勇地击退了敌人的进攻，取得了黄洋界的保卫战的胜利。9月下旬，毛泽东率领红军大队回到井冈山，三战三捷，收复了大部分失地，恢复并发展了井冈山根据地。

为了纠正“左”倾冒险错误和右倾悲观情绪，总结湘赣边界一年来的斗争经验，1928年10月25日在宁冈茅坪召开大会。大会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

决议案，正确地阐明了大革命失败后中国革命的性质、形势和策略的问题，并且对“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这个关键问题作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回答。这就大大加强了党员和群众的斗争信心。

1928年底，红五军的一部分到达井冈山。1928年7月22日，彭德怀、滕代远、黄公略率领湖南独立第五师第一团在平江举行起义，成立了红五军，军长彭德怀，副军长黄公略，党代表滕代远，政治部主任杨克明，共约4000人。7月23日，又成立了平江县工农民主政府。平江起义后，湖南军阀纠集六个团的兵力围攻红五军。8月1日，红五军退出平江县城，在湖南的平江、浏阳和江西的万载、修水、铜鼓、萍乡一带，开展游击战争，开辟湘鄂赣边革命根据地。12月11日，红五军在彭德怀、滕代远、黄公略的率领下，与红四军在宁冈县城胜利会师。红五军和红四军的会师，进一步壮大了井冈山的革命力量。

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和发展，为中国革命在大革命失败后找到了一条革命发展的正确的道路，这就是：建立农村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

遵义会议

遵义城，是贵州北部的一个重镇。它北靠娄山，南临乌江，是贵阳到重庆的交通要道，也是汉、苗、布依、回各族商旅云集的场所，市面十分繁华。1935年1月，红军长征到达遵义城。不久，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这里召开。《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指出：遵义会议“在党的历史上，是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1931年1月，党的六届四中全会上，在共产国际代表米夫的支持下，以“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自居的王明，掌握了这次会议的领导权。这次会议，标志着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在党内占据了统治地位。王明没认识到现阶段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长期性的基本特点，错误地认为整个资产阶级是革命的对象，他们不顾敌强我弱的实情，继续强调全国性的“革命路线”和党在全国范围内的“进攻路线”；他们竭力照搬苏联经验，强调工人的罢工斗争，鄙视毛泽东、朱德搞的红军和农村根据地。要红军都去打大城市，配合工人运动；对那些持不同意见的同志，他们实行残酷的宗派主义政策。

王明等人的左倾机会主义，给中国革命带来了极其严重的后果。在国民党统治的大城市里，他们不听正确意见，拒绝执行必要的退却和防御，不要合法斗争，硬着头皮搞为当时情况根本不允许的罢工、罢课、罢市斗争及示威游行。结果，使党在白区的组织几乎遭到了百分之百的破坏，连王明的临时中央也无法在上海藏身，只好于1933年1月迁到中央苏区避难。这样，在王明等人到来之后，中央苏区便也不得安宁了。

临时中央（王明已到莫斯科汇报）由博古代替他迁到革命根据地后，就让毛泽东靠边站了。对那些不同意他们主张的人，他们无情地打击。先后在福建、江西开展了反“罗明路线”、反邓、毛、谢、古“江西罗明路线”的斗争。他们的这些作法，弄得苏区人心惶惶，对于反第五次“围剿”的斗争，产生了极为不利的影晌。

1933年，蒋介石自任总司令，纠集50万大军向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了第五次军事“围剿”。他总结以前几次“围剿”失败的教训，制订所谓“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策略，采取堡垒主义的形式向中央苏区推进。采取“稳扎稳打，步步为营”。

中央苏区红军已有8万多人，根据地日益巩固，又有前四次反“围剿”胜利的经验，士气高涨，形成了粉碎敌人新的进攻的有利条件。如果按照毛泽东的战术，完全有可能打败敌人，但这时临时中央负责军事的博古不懂军事，一味信任苏联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可李德不了解中国国情，硬把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正规战的经验搬到中国来，对毛泽东等创造的符合中国实际的游击战和积极防御战的经验不屑一顾，盲目推行了一条“左”倾的军事路线，结果使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开始后就陷入了极端被动的地位。

战争一开始，博古和李德就提出所谓“两条路线的决战”的口号，和“不放弃根据地一寸土地”“御敌于国门之外”的方针，攻击敌人的坚固堡垒，结果使红军主力陷于敌人优势兵力和堡垒之间，处处挨打，十分被动。正在此时，国民党十九路军的将士在福建前线发动了福建事变，建立了福建人民政府，公开宣布反蒋抗日，并派人同红军谈判合作。

但是，博古等人硬说十九路军的行为是“假革命”、“欺骗群众”，因而不肯同他们有任何合作，拒绝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等的正确意见。结

果，孤立无援的福建政府在蒋介石的军事进攻和政治分化瓦解之下很快失败，红军也失去了一次极好的打破敌人“围剿”的宝贵机会。随后，蒋介石便集中全力进攻中央红军了。

1934年1月，中共临时中央在江西瑞金召开六届五中全会。这次会议把“左”倾机会主义推到了顶点。根据地形势更加严峻，由于打击面太大，造成了社会混乱。这就更加增大了粉碎敌人“围剿”的困难。

4月中旬，蒋介石集中优势兵力进攻中央苏区的北大门广昌。博古、李德不顾敌强我弱的情况，仍然决定与敌主力硬拼，双方激战18天，红军伤亡惨重，广昌失守。随后，敌军日益深入我苏区腹地，在遭到重大挫折后，“左”倾指挥者便灰心丧气，处处设防，由进攻中的冒险主义转变为防御中的保守主义。红军陷入了更加被动挨打的局面。这时，毛泽东再次提出将红军主力调到湖南，并牵着江西敌人到湖南消灭的挽救危局的方针，但遭到拒绝。“此计不用，打破敌人‘围剿’的希望最后断绝，剩下长征一条路了。”

由于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中央红军被迫放弃辛辛苦苦建立起来的根据地，实行军事战略大转移。1934年10月10日，除陈毅率领的一部分留守部队外，中共中央从瑞金出发，率领中央红军主力8.6万余人，开始了向湘西的战略转移。

中央红军长征开始时，“左”倾领导者惊慌失措，实行了退却中的逃跑主义。对长征这么重大的行动，事先秘而不宣。长征开始后，对于为什么要撤离苏区、当前的任务是什么、要到哪里去，这样一些基本问题都始终没有和广大将士说清楚。因此，大家出发前糊糊涂涂地不知要做什么准备，只好采取大搬家的方式，组织了庞大的后方机构，携带了大批武器、几千副挑子等等。大批的战斗队变成了掩护队，不能机动地执行战斗任务。由于队伍实在是太多了，行动极为不便，经常会出现7、8万人在一山中羊肠小道中缓慢移动的情况。

在红军前进的道路上，蒋介石布置了4道封锁线，由湘军、粤军、桂军分别布防。英勇的红军战士经过浴血奋战，虽然连续突破了漳水、宜章、粤汉路、湘江四道封锁线，但也付出了极为沉重的代价。特别是湘江一役，损失尤为惨重。经过4道封锁线后，红军人数由8万多人锐减到仅剩3万多人。

这时，红二、六军团为策应中央红军，在川黔湘边界展开了强大的攻势。蒋介石察觉到红军前进的方向是要到湘西与二、六军团会合，便立即调集重兵，布置好口袋形阵势，等着红军去钻。在这种情况下，红军该怎么办呢？

长征开始后，广大红军干部和战士看到第五次反“围剿”以来，我们一直处于不利的状态，现在又几乎陷入绝境，这与前四次反“围剿”痛快淋漓的大胜仗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他们开始怀念起毛泽东的正确领导来。还在苏区时，许多红军指挥员和党政干部，就对当时临时中央主要负责人在军事上的作法逐渐产生了不满和怀疑。一些军团指挥员多次向他们提出意见，有的还同他们发生了激烈的争论；被排斥在领导岗位之外的毛泽东，怀着高度的革命责任心，也多次提出自己的正确意见和主张；但是，这些都被当成了耳边风。随着长征中红军的不断失利，这种不满情绪日益暴露出来，到湘江战役后达到了顶点。许多指战员忿忿地说：“过去几次反‘围剿’打了许多恶仗，不但没有这么大的消耗，还壮大了许多倍，现在光挨打，真气人！”第三军团长彭德怀更气愤地说：“这样抬着棺材走路，哪像个打仗的样子？”

严峻的事实，使一些曾犯过“左”倾错误的同志逐渐醒悟过来。还在第

五次“反围剿”刚开始不久，张闻天就怀疑：“这样打下去，我们能有胜利的前途吗？”后因广昌战役与李德、博古意见不合，而遭到排挤。王稼祥更是从亲身体验中认识到这样下去不行。

长征开始后，王稼祥因伤坐担架，毛泽东也因病坐担架，这样，两人就在行军途中谈开了。晚上，宿营时，毛泽东又建议张闻天同他和王稼祥住一块。这样，就形成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反对李德、博古领导的中央队的三人集团。毛泽东利用一切时间向他们分析了在反“围剿”中中央在军事领导上的错误，并针对具体情况，谈了马列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情况相结合的道理。王、张很快地接受了毛泽东的意见，加深了自己对以前的错误的认识，产生了改变错误领导的决心，正象当时王稼祥所说：“到时候要开会，把他们‘轰’下来”，并决定支持毛泽东同志重新出来工作。周恩来和朱德历来比较尊重毛泽东，他们当然是支持他的。另外，毛泽东还利用一切机会，向有关干部和指挥员进行说服教育工作，直到很久以后李德还恼火地说：“毛泽东不顾行军纪律，一会儿呆在这个军团，一会儿呆在那个军团，目的无非是劝诱军团指挥员和政委接受他的思想。”广大指战员们的呼声、毛泽东的说服教育工作，特别是王稼祥、张闻天的思想转变，为遵义会议的召开奠定了思想基础。

1934年12月11日，中央红军在突破蒋介石四道封锁线后，到达湖南通道县。“左”倾领导者仍然一门心思想去湘西与二、六军团会合。可如果真去，就等于是拿已剩下不多的这点红军力量去钻蒋介石的口袋，红军就有全军覆没的危险。在这危机关头，毛泽东极力主张放弃原来的想法，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进发。于是，临时中央在通道举行了临时碰头会。会上，毛泽东重申了自己的主张，并说那里“敌人力量薄弱，我们何不来个避实就虚，甩掉眼前的强敌，到贵州去。为什么一定要去钻口袋呢？大路朝天，各走一边嘛！”毛泽东的这番话，得到与会大多数人的共鸣。李德、博古虽还没有放弃与红二、六军团会师的想法，但他们不知道怎样才能突破蒋介石的第5道封锁线，于是只好暂时同意毛泽东避实就虚的建议。12月4日，中央红军向贵州黎平进发。通道会议的转兵西进，开始扭转了红军长征以来处处受制的局面，红军开始争得主动权。

12月15日，红军轻而易举地打败了黔东军阀王家烈的部队，占领了黎平城。这时候，敌人的大部队因红军的突然转向而被弄得措手不及，一时未能跟上，红军在黎平获得了一个宝贵的休息机会。因为通道会议有关红军进军方面问题的争论还没有结果，所以中央决定18日在黎平召开政治局会议。会议一开始，多数人就在红军战略转移的问题上与李德、博古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会议气氛较紧张，发言人都下意识地提高了嗓门。一向温文尔雅的周恩来在会上几次发言，严厉批评李德，支持毛泽东的主张。最后，会议采纳了毛泽东的建议，决定正式放弃与红二、六军团会师和建立湘西根据地的计划，通过《中央政治局关于在川黔边建立根据地的决议》。在决议中决定以贵州遵义为中心区，建立川黔边根据地；整编红军队伍；在适当的时候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以便审查黎平会议的决议和总结第五次反“围剿”以及长征以来军事指挥上的经验教训。黎平会议是自王明“左”倾领导者排斥毛泽东后，党中央在重大决策问题上第一次接受毛泽东的正确意见。这次会议改变了红军前进的方向，是红军战略转移的开始，也是红军变被动为主动的开始，为遵义会议纠正党内“左”倾冒险主义在军事上的错误准备了条件。

12月20日，中央红军按照军委的决定，分两路向乌江地区挺进。沿途行动相当顺利。12月31日，红军到达距乌江约30里的集镇——猴场（今草塘）。这时，李德又提出两个方案，一是不过乌江；二是回头去与红二、六军团会合。为了确定红军进入川黔边地区后的行动方针，中央政治局又于1935年1月1日在猴场举行政治局会议。会上，毛泽东反驳了李德的建议，提出在川黔边地区迂回战斗，以便粉碎蒋介石的“围剿”。毛泽东的建议得到了大多数人的赞同。接着，会议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重申创建川黔边根据地并准备向川南发展的战略方针；提出红军整编和加强红军政治工作等任务。会上，中央政治局还做出一条决定：关于作战方针以及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作报告。这是对第五次反“围剿”以来博古、李德包办军事指挥权的一种组织上的限制。实际上从此以后，李德、博古在军事上的指挥权就被停止了，毛泽东实际上参与了中央军事上的指挥工作。这次会议为遵义会议纠正“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确定毛泽东在军事上的指挥权打下了基础。

猴场会议后，红军指战员们连新年饭也没好好吃，就按照原定计划赶奔乌江。1月4日，部队渡过乌江，把国民党的追兵甩在了乌江以东和以南地区。1月7日，红军乘胜前进，一举攻下了遵义城。

1935年1月15日~17日，广大指战员盼望已久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遵义召开。出席会议的政治局委员有：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朱德、陈云、博古，侯补委员有：王稼祥、刘少奇、邓发、凯丰，还有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总政治部代主任李富春，第一军团长林彪、政委聂荣臻，三军团长彭德怀、政委杨尚昆，五军团政委李卓然。邓小平以党中央秘书长身份参加了会议。会议中途，彭德怀因前线发生战斗，提前离开了。九军团长罗炳辉、政委蔡树藩因为部队没有渡过乌江而没有参加会议；五军团长董振堂也未出席这次会议。共产国际驻中国军事顾问李德以及为他担任翻译的伍修权，列席了会议。

会议是在遵义旧城一个叫柏辉章的军阀公馆二楼一个长方形房间召开的。房间不大，天花板中央吊着一盏旧式煤油灯，房中间放着一张破旧的桌子，25把形状各异、大小不一的椅子摆在桌子周围。因为天气冷，还用铁炉生了一盆炭火。会议由博古主持，他坐在长条桌子中间的位置上，一直没动。紧挨着坐的是毛泽东和周恩来，其他的参加者不象现在这样，有个名单座次，每次来了随便找个凳子坐下就行了。李德大概因为心里不舒服，因此一直坐在门边，凳子放在一个很别扭的位置上，翻译伍修权紧挨着坐在他旁边。另外，还有两个人是躺在担架上来开会的：一个是王稼祥、另一个是聂荣臻。会议一般都是晚饭后开始，一直到深夜。因为白天中央政治局和军委都要处理战事和许多日常事务。

会议首先由中共中央临时负责人博古作关于反对第五次“围剿”的报告。在报告中，博古为失败的错误领导进行辩护。他把失败的原因归于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力量过于强大，白区和各苏区的斗争配合不够等等客观困难，而不承认主要原因是他和李德压制正确意见、在军事指挥上犯了严重错误。随后，周恩来就军事问题作了副报告。在报告中，周恩来承认在第五次反“围剿”时中央政策不对头，指出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军事领导的战略战术错误，并主动承担了责任，作了极为诚恳的自我批评，同时，也批评了李德和博古。周恩来勇于承担责任的态度给与会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张闻天按会前与毛

泽东、王稼祥共同商量好的意见，作了反对“左”倾军事错误的报告，比较系统地批评了博古、李德军事上的指挥错误。接着，毛泽东作了一个多小时的长篇发言，是会议期间发言最长的一个。在发言中，毛泽东对博古、李德军事指挥上的错误作了切中要害的分析，指出他们在军事领导上犯的错误是进攻中的冒险主义、防守中的保守主义和转移中的逃跑主义；他还阐述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战术问题，以及此后在军事上应该采取的方针。毛泽东的讲话赢得了热烈的掌声，因为他道出大多数指挥员长久以来闷在心里没有说出来的话。王稼祥在发言中，严厉地批评了博古和李德在军事上的错误领导，旗帜鲜明地支持毛泽东的正确意见，表示拥护毛泽东出来领导红军。张闻天和朱德也表示了明确态度，支持毛泽东正确的观点。虽然朱德是个稳重谦逊的人，但这次发言时，却声色俱厉地追究临时中央领导的错误，并且说：“如果继续这样的领导，我们就不能再跟着走下去！”周恩来再次发言，表示坚决支持毛泽东对第五次反“围剿”中军事领导错误的批评；并竭力推举毛泽东担任党和红军的领袖。他的建议得到与会大多数人的赞同。刘少奇、聂荣臻、彭德怀、刘伯承、李富春、陈云、邓小平等多数与会同志也发了言，支持毛泽东的发言。林彪在会上虽然没说什么，但他是赞同毛泽东的。只有何克全（凯丰）在发言中不同意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的意见，继续为博古、李德的错误辩解，甚至狂妄地对毛泽东说：“你懂得什么马列主义？你顶多是看了些《孙子兵法》！”并对会议持保留意见。李德是列席会议，他在发言中为自己和博古在军事上的“左”倾错误辩解，拒绝大家对他的批评，把失败归结为客观原因和临时中央身上，说他只是一个“顾问”。大部分时间里，他一言不发，只是闷着头一个劲儿地抽烟。博古在会上虽然没有完全意识到自己的错误，但他主持会议期间，没有利用职权压制不同意见，表现出了一定的民主作风和宽宏的气度。会后，他又能坚决服从和执行中央的决定，能够顾全大局，把担子交出来，显示出了一个共产党员应有的品质。

会议除了总结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经验教训，批评李德、博古军事错误领导外，还就红军今后的行动方向作了讨论。大家认为，贵州人烟稀少，比较贫穷，再加上党在这里没有工作基础，要想在这里建立根据地困难很大，决定放弃以黔北为中心建立根据地的原定计划。会上，刘伯承和聂荣臻建议，中央红军打过长江去，把队伍开到川西北去建立根据地。因为：一来四川是西南首富，人口稠密；二来有四方面军的川陕根据地可以接应；三来四川对外交通不便，当地军阀又长期有排外思想，蒋介石想大量调兵不容易。经表决后，会议采纳了这个建议，决定放弃黎平会议以黔北为中心创造革命根据地的计划，决定红军渡过长江在成都西南或西北地区建立根据地。

会议决定由张闻天起草决议，委托政治局常委审查后，发到支部中去讨论。张闻天在会后根据与会多数人特别是毛泽东发言的内容，起草了中共中央《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这个决议写出后，经过充分讨论，最后在中央红军到达云南省扎西县后召开的中央会议上正式通过。《决议》认为博古作的关于五次“围剿”总结的报告“基本上是不正确的”，充分肯定了毛泽东等指挥红军取得多次反“围剿”胜利的战略战术的基本原则。并明确指出：博古、李德在军事领导上战略战术上的单纯防御路线的错误是中央苏区不能粉碎敌人五次“围剿”的主要原因。《决议》分析了第五次反“围剿”的国内敌我力量对比的情况及我粉碎敌人第五次反“围剿”的有利与不利条件，指出在敌强我弱的条件下，“我们的战略路线应该是决战防御（攻

势防御)、集中优势兵力、选择敌人的弱点,在运动中有把握地去消灭敌人的一部或大部。以各个击破敌人,彻底粉碎敌人的“围剿”。然而在反对第五次“围剿”战争中,却以单纯防御路线代替了决战防御,以阵地堡垒战代替了运动战,并以所谓“短促突击”的战术原则来支持这种单纯的战略路线。“这就使敌人持久战与堡垒主义的战略战术,达到了他的目的”。接着《决议》详细分析了左倾冒险主义者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军事指挥上战略战术的具体错误;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决议》认为在福建事变发生的情况下,“利用反革命内部的每一冲突,为积极方面扩大他们内部的裂痕,使我们利于转入反攻与进攻,是我们粉碎敌人‘围剿’的重要关键”。认为党中央采取同十九路军订立停战协定,推动十九路军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与蒋介石的方针是正确的。但博古、李德等人根本不了解利用十九路军事变是粉碎五次“围剿”的重要关键之一,没有采取行动配合十九路军的行动,从而失去了这一宝贵的机会,导致了第五次反“围剿”的不利。

《决议》指出,在战略转变与实行突围的问题上,李德、博古同样是犯了原则上的错误。他们没有及时地转变我们的战略方针,“实行战略上的退却,以保持我们主力红军的有生力量”,因而贻误了战机,再加上阵地战的发挥,给了红军以很大的损害。就是在突围的时候,也“基本上不是坚决的与战斗的,而是一种惊慌失措的逃跑以及搬家式的行动”。这些政治上与军事上组织上的错误,特别是战略方针不放在争取于必要与有利时机同敌人决战的原则上,就使得自己经常处于被动地位,经常遭到敌人打击。

《决议》认为李德的领导方式“是极端的恶劣”,军委的一切工作由他们包办,惩办主义有了很大的发展,下层指挥员的机断专行与创造性被抹煞掉了。博古代表中央领导军委工作,他对李德在作战指挥上所犯的错误以及军委内部不正常的现象,不但没有及时纠正,而且积极地拥护和助长了这种错误的发展。“同时政治局更认为过去书记处与政治局自己对于军委的领导是非常不够的”。因此《决议》认为:“为了粉碎敌人新的围攻”,“必须彻底纠正过去军事领导上的错误,并改善军委领导方式。”

最后,会议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选举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在常委中再进行适当分工;取消在长征前成立的三人团,仍由军事最高首长朱德、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而周恩来是党内委托的对于军事指挥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人。扩大会完毕后,常委即进行分工,以毛泽东为周恩来同志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随后,在红军转战到川滇黔三省交界的鸡鸣一带,政治局常委分工,决定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总的责任,3月4日,中央军委在第二次驻遵义时成立前敌司令部,以朱德为司令,毛泽东为政治委员。3月11日,成立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小组,负责指挥全军的军事行动。在当时紧急的战争环境下,这是党中央最重要的指挥机构。

在紧急的战争环境下召开的遵义会议,虽然在历史的长河中只属于瞬间的事情,但是,它在中国历史上特别是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痕迹。

从历史上看,这是中国共产党生死攸关的一个转折点。这次会议,并没有全面地分析和讨论政治路线方面的问题,因为在当时,就党多年来工作上所有重大问题作一个讨论是不可能的。而且,党中央对这些问题取得一致性的看法需要一个过程,长征路上的遵义会议,没有时间也没有这个精力,所以,《决议》只笼统地肯定了党中央当时的政治路线,对于造成党中央在军

事上犯的指挥错误的深刻的政治原因，并没有讨论。这个问题到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才完成。需要特别指出的是，遵义会议是在与共产国际中断联系的情况下召开的，这些成果是独立自主取得的，因此，这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地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开始。它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开始走上成熟。

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一反以前的作战方式，好象忽然获得了新生。在毛泽东等的领导下，根据实际战情的变化，忽南忽北，忽东忽西，完全掌握了战争的主动权。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把蒋介石弄得晕头转向，最后，红军终于摆脱了蒋介石几十万大军的围追堵截，获得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性意义的重大胜利！

